

总第56期
2019年02期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五四运动百年祭

长征中博古交权的
“鸡鸣三省”石厢子会议

改革开放是发展内陆德阳的关键一招

寻找陈桂兰：江湖庙堂，生死两茫茫

四川党史

SICHUANDANGSHI

准印证号：四川省连续性内部资料准印证第01-012号

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四川代表团 举行全体会议，集中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3月5日下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四川代表团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全体会议，集中审议李克强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

作为四川选出的全国人大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与四川代表团全体代表一同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并发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曹建明，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王东明，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代表团团长彭清华，省委副书记、省长、代表团副团长尹力参加审议。

根据大会秘书处安排，中国人民银行

行长易纲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全国人大财经委、国务院办公厅、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和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有关同志，到团听取审议意见。





五四运动孕育了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主要内容的伟大五四精神。这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生动写照，是中国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力量源泉，是我们必须万分珍视、大力弘扬的宝贵精神财富。百年历史昭示我们：中国共产党是五四精神最忠诚的继承者，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始终是推动我国各项事业不断前进的根本保证。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推动我国各项事业不断前进的强大动力。道路关乎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唯一正确的选择。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只有走在时代前列，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建功立业、成就远大抱负。

——摘选自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彭清华在四川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上的讲话

四川党史

SICHUANDANGSHI

2019年02期

/总第56期

主管主办: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

名誉顾问:

谢世杰 秦玉琴 陶武先 席义方

顾问:

王承先 陈荣仲 吴得民 卢耸岗
赵庆东 罗宗荣 张继禄 彭亚新
龚自德 王庭科 彭穗宁 王光华
侯德邻 张国新 鲜于浩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刘晓晨

副主任:

李 仁 江红英 郭生春

委 员:

严仕兵 周锐京 戴忠东 谢海彬
范 斌 王 皓 屠火明 魏家骏
彭本瑜 邱 俊 李思源 敬东阳
唐广生 文 漳 余崇威 罗兴林
兰吉春 李 勇 侯立新 蒋吉平
罗之聪 师 伟 徐永利 肖 飞
罗 瑾

封 面:

“鸡鸣三省”石厢子会议会址

封 二:

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四川代表团
举行全体会议,集中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封 三:

省委党史研究室积极参与龙泉山城市
森林公园建设

封 底:

德阳绵竹新建的月季产业园

卷首语

- 01 摘自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彭清华在四川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上的讲话

学习园地

- 04 五四运动百年祭

/ 金冲及

专题研究

- 11 长征中博古交权的“鸡鸣三省”石厢子会议

/ 颜 林

- 18 改革开放是发展内陆德阳的关键一招

/ 中共德阳市委党史研究室

- 21 对邓小平农村改革发展思想的再认识

/ 吉 勇

- 25 践行党的民族政策 发展诠释长征精神

/ 翁少琼

- 31 向阳乡全国首摘人民公社牌子

/ 谢海彬

工作交流

- 34 坚持“党史姓党”为党修史立传
——论新时代“党史人”的使命与担当

/ 万晓翠 段雯

人物春秋

- 38 在屏山传播马克思主义第一人——徐经邦

史海钩沉

- 39 寻找陈桂兰：江湖庙堂，生死两茫茫

/ 蔡 勇

动态窗口

- 47 省委党史研究室贯彻落实彭清华书记批示精神
谋划部署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工作

刘晓晨主任一行赴乐山、眉山等地调研指导党史工作

刘晓晨主任专题研究四川网上党史馆和四川党史文献数据库建设工作

省委党史研究室、省地方志办联合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四川大事记》编写初稿审改会

省委党史研究室与来川的新疆党史工作考察调研组进行交流座谈

雅安市举办“学习强国”有奖知识竞赛



四川党史

SICHUANDANGSHI

准印证号：四川省连续性内部资料准印证第01-012号

刊名题签：何应辉

《四川党史》编辑部

编辑部主任：范 斌

编辑部副主任：蒲志明 马 睿

编 辑：王治刚

美 术 编 辑：《廉政瞭望》杂志社

● 地址：成都市青羊区商业后街3号

● 邮编：610031

● 电话：028-86603910

● 电子邮箱：scds.2007@163.com

● 网址：www.scds.org.cn

● 准印证号：四川省连续性内部资料
准印证第01-012号

● 印刷单位：四川川林印刷有限公司

● 印刷日期：2019年04月

● 印数：2000册

● 发送对象：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全国各省（区、市）党史工作部门，全省
各级党史工作部门，省级各机关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扫码关注 四川党史



五四运动百年祭

金冲及

五四运动到现在，整整 100 年了。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五四运动，爆发于民族危难之际，是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是一场中国人民为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凝聚民族力量而掀起的伟大社会革命运动，是一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的伟大思想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以磅礴之力鼓动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志向和信心。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个重大事件，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为什么

这么说？因为那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折点，从那时起，众多中国先进分子找到了一个全新的社会理想和奋斗目标，那就是要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旧时代结束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开始了。

五四运动不是凭空发生的，也不是单靠少数先进分子的主观意愿和决心就能发动起来的。它是历史大趋势的产物，是中华民族对当时祖国苦难境遇的满腔悲愤和对创造合理新社会的强烈追求激发出来的。这是五四运动所以能发生的内在动力。

历史的回顾

生活在今天的年轻人也许已很难想象到：当年

的中国正处在何等深重的苦难中。

中国是有着几千年绵延不绝历史的文明古国，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曾经作出巨大贡献，但到近代却大大落后了。鸦片战争中，西方国家倚仗船坚炮利，迫使中国放弃领土和主权的完整，走上听凭外人欺凌和摆布的半殖民地道路。中日甲午战争后，列强在中国纷纷划分势力范围，全世界所有资本主义大国组成八国联军武装占领中国首都北京达一年之久，北京家家户户门口被强迫悬挂占领国的国旗，一系列严重丧权辱国的条约把中国压迫得透不过气来，濒临灭亡的边缘。

昔日的光辉和眼前的悲惨境遇形成如此强烈的对比，更使有良心的中国人无不感到极度屈辱和悲愤。维新志士谭嗣同写下这样的诗句：“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成立兴中会，首先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写道：“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忍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国势的危急、民族的苦难，既使人感到极大的痛苦，也驱使人们下最大的决心奋起变革现状。

出路在哪里？在一百来年时间内，世界上似乎只有一个现成的榜样：向西方国家学习，寻找救国的真理。一些启蒙思想家最早是以英国为典范。以后，戊戌维新想仿效的是沙俄的彼得大帝改革和日本的明治维新。辛亥革命想学习的是法国革命和美国独立。它们都在不同程度内推动了中华民族的进步。

戊戌维新运动帮助广大知识分子多少知道了世界大势和中国的严重民族危机，在一定范围内传布西方的“新学”，初步宣传了民权思想，特别是通过翻译《天演论》等，有力地宣传“变”的观念，猛烈冲击“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陈旧观念，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由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更造就中国在20世纪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大变化：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

制度，创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制国家。《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尽管人民在事实上并没有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但开始认为自己应该是国家的主人了。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第一次出现的大事，使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使反动统治秩序再也无法稳定下来。

但是，即便经过辛亥革命这样全国规模的运动，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并没有改变，人民悲惨的境遇也没有改变。中央政权落到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里。对外，接受日本企图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被国人视为刻骨铭心的“国耻”。国内，出现连年不断的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还出现过袁世凯和张勋两次企图复辟帝制的丑剧。正如亲身经历过这段历史的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所说：“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

人们原来对辛亥革命和共和制度的建立抱有很大的热望。希望越大，失望带来的痛苦也越大。不少人陷于巨大的痛苦中：为什么中国会处于这种状况？残酷的现实驱使人们不能不对中国的现实和未来重新思考。他们没有停顿自己的脚步，没有只是停留在消极的苦闷中，而是苦苦地继续向前探求怎样才能救国救民的真理。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内因从来是变化的根据，外因只是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条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大历史观，把五四运动放到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奋斗史中来认识和把握。正是中国近代以往的全部历史，为五四运动的到来作了充分的准备。如果没有大批先进的中国人在这种令人极端痛苦的环境下不惜一切自我牺牲的顽强追求和探索，如果没有人们对多种多样理念和方案在实践中反复比较和选择，如果没有国际国内大环境急遽变动的刺激和启迪，就不可能有初期新文化运动，更不可能有里程碑意义的五四爱国运动出现。

初期新文化运动

初期新文化运动，是五四运动的前奏。它以对辛亥革命后黑暗局势的反思为出发点，改变了原本正陷于苦闷沉寂中的思想界。它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最初叫《青年杂志》），一纸风行全国，以生气勃勃的内容和鲜明泼辣的语言，发人深省，在众多知识青年中起了举足轻重的引领作用。

陈独秀和初期新文化运动的许多重要成员，是辛亥革命的积极参加者。他们认为辛亥革命之所以没有能达到预期效果而坠入低潮，主要教训在于只从事政治斗争，而在思想领域内没有对更深层的盘踞在人们头脑中的旧文化、旧礼教进行猛烈的扫荡。这种旧文化、旧礼教，经过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者精心培育和推行，人们自幼便被系统灌输这一整套纲常理念，已形成近乎传统的习惯力量，无形地支配着社会秩序和众人行为。如果人们还是抱着原有的旧观念，没有真正树立起新思想、新道德，即便制度在表面上似乎有了改变，做起来依然一切如旧。因此，必须为辛亥革命“补课”，把它放在最重要的地位。

陈独秀喊得最响的口号是“民主”和“科学”，把它们称为“德先生”和“赛先生”。他写道：“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民主和科学的提出，是切中时弊的。民主是专制的对立物，科学是愚昧和盲从的对立物。陈独秀把这称为“伦理的觉悟”，称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认为这才抓住了问题的根本。这在思想界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以《新青年》为主阵地发动的这一次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的批判，其尖锐彻底的程度，远远超过辛亥革命时期。这在中国思想界起了前所未有的摧陷廓清、振聋发聩的作用，跨出了一大步，产生了新的觉醒。《新青年》的发行量，从创刊时一千册左右，增加到一万五六千册，可见它在社会上的影响迅速扩大。如果没有经历这样一场对人们头脑中本已根深蒂固的旧思想、旧礼教的激烈大扫荡，没有使人们思想空前活跃起来，要随之出现1919年那样规模的五四爱国运动是很难做到的。

当然也要看到，初期新文化运动仍然是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旗帜下进行的。他们的思想武器仍是以个人为中心的“个性解放”。陈独秀在1916年初写道：“人间百行，皆以自我为中心，此而丧失，他何足言？奴隶道德者，即丧失此中心，一切操行，悉非义由己起，附属他人以为功过者也。”又写道：“集人成国，个人之人格高，斯国家之人格亦高；个人之权巩固，斯国家之权亦巩固。而吾国自古相传之道德政治，胥反乎是。”高一涵在《青年杂志》的一篇文章中写道：“社会集多数小己而成者也。小己为社会之一员，社会为小己所群集。故不谋一己之利益，即无由致社会之发达。”这种思想在反对专制和迷信时有着进步意义，但他们的着眼点，主要还只是个人的权利，而不是人民的整体利益。

胡适极力推崇挪威作家易卜生，写道：“易卜生最可代表十九世纪欧洲的个人主义的精华。”《新青年》还出过一期“易卜生专号”。易卜生有个著名剧本《娜拉》在当时中国很受重视，写的是女主人公不甘心做“丈夫的奴隶”而离家出走。它被人热烈地赞誉为“女性的自觉”。

娜拉的离家出走，是有反抗性的，但它是不是就表明了妇女的解放？鲁迅比许多人清醒得多。他在《娜拉走后怎样》的讲演中，以更宽广的视野尖锐地指出：“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如果是一匹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

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以走。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如果经济制度竟改革了，那上文当然完全是废话。”

鲁迅的观察是深刻的。他所谈的不只是一个妇女解放问题，而且引导人们思考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个人和社会的关系、“小我”和“大我”的关系。如果停留在这里，不进行社会的变革，讲得再痛快，也只能流于空谈，不能使中国的问题得到根本的解决。

在当时的中国，对绝大多数人来说，离开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离开社会的改造，连生存都没有保障，哪能有什么个性解放和个人前途可言？国家好，民族好，个人才会好。于是，“改造社会”、“建设新社会”的呼声越来越高，代替“个性解放”，成为更多先进青年关心的焦点。改造社会的问题在思想界提到如此突出的地位，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它的意义十分深远，在以后就表现得越来越清楚。

但是，怎样才能使这个污浊的社会得到改造？需要建设的新社会应该是怎么样的？人们一时依然感到迷惘。这时，打着“新思潮”旗号的各种思想流派纷纷传入中国。在西方享有盛名的学者杜威和罗素来中国到处讲演，系统地宣传他们的主张。胡适、张东荪等花了很大力量来鼓吹，想用以影响中国新文化发展的方向。这两件事一时显得很热闹，却没有在中国人中间扎下多少根来。原因很简单：尽管他们讲得头头是道，听起来很新鲜，但不能解决中国人最关心的实际问题，青年毛泽东当时就说：“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

全面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老路已经走近谷底。路在何方？人们正在继续探索和追求。

五四风暴的袭来

成为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中转折点的，是发生在1919年5月4日的五四爱国运动。同初期新文化运

动时相比，发生的变化主要有三点：第一，初期新文化运动反对的矛头主要指向封建旧文化、旧礼教，而这时更突出的是一场反对西方列强强权政治、为民族谋复兴的伟大爱国运动。第二，初期新文化运动的活动层面主要是在人数毕竟有限的知识阶层中，活动方式主要是在刊物和报纸上展开的激烈论战，而后者却是规模空前、有成千上万各阶层群众投入的爱国群众运动，活动方式也更加激进得多。第三，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先进分子中开始广泛传播。当然，这两个阶段又一脉相承、难以截然分开。这个巨大转折的发生，既是中国爱国者坚持顽强探索救国救民真理取得的结果，又由此时此刻世界大局强烈变动所直接导致。这在以前是不可能出现的。

前面说过，鸦片战争失败后，先进的中国人在长时间内一直苦苦地向西方国家寻找可以救中国的真理。这不奇怪，因为那时在世界上只有西方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现代国家。中国社会内部，也没有形成足够壮大的新兴社会力量。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人们对向西方寻找真理这种追求抱着强烈的信心，很少有什么怀疑，那是可以理解的。辛亥革命时是这样，要为辛亥革命“补课”的初期新文化运动也是这样。

但是，中国人苦苦地向西方寻求救国的真理已经几十年了，却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从1914年到1918年发生了史无前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次大战前后的事实带给了中国人原来没有想到过的许多强烈的新认识。

第一，中国的先进分子在长时间内钦羡西方国家的富强，把它理想化，一意看作中国仿效的榜样。但经过这次大战后的欧洲却是令人震惊地满目疮痍、残破不堪、贫民难以生活、社会矛盾异常尖锐。战后不久到英国的周恩来在通信中写道：“吾人初旅欧土，第一印象感触于吾人眼帘者，即大战后欧洲社会所受巨大之影响，及其显著之不安现状也。影响维何？曰生产力之缺乏，经济界之恐慌，生活之窘困。”从一心“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到认为“社会革命潮流东向，吾国又何能免？”这是



多么大的变化！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西方模式并不像原先预期中那样完美。西方国家在中国先进分子心目中，顿时失去原有的光辉，感到需要寻找新的路。这是实际生活给中国人上了很有用的一堂课。

第二，大战结束后召开的巴黎和会，曾使中国人对它抱着极大的期待，认为这是“公理战胜强权”的体现。他们还用许多美好的语言把自己装点起来。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貌似公正的“十四点原则”，更使许多人极为兴奋。陈独秀甚至称赞威尔逊“是世界上第一个好人”。和会开会之时，《每周评论》上就写道：“列强果能赞成这个大同盟，从此以后，人道有了光明，民治可以普遍了。”

但无情的事实是：西方列强“十人会议”秘密商定将德国在山东强占的权益不归还给战胜国之一的中国，而转交给日本，而且不容讨论。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顾维钧在回忆录中写道：“以前我们也曾想过最终方案可能不会太好，但却不曾料到结果竟是如此之惨。”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西方列强口头上的漂亮承诺，到头来竟全是骗人的假话。这种事给中国人的刺激实在太太，愤怒顿时像火山那样爆发了。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等校学生三千余人在天安门集合，高呼“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口号，举行爱国抗议游行。他们的文言宣言写道：

“山东亡，是中国亡矣！我同胞处此大地，有此山河，岂能目睹此强暴之欺凌我，压迫我，奴隶我，牛马我，而不作万死一生之呼救乎！”白话宣言写道：“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许多沿街的路人感动得潸然泪下。游行队伍先是要到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抗议，但被阻挡而无法通行。愤怒的学生奔赴在山东问题上负有严重责任的曹汝霖家采取了激烈行动，不少学生被捕。第二天，北京大专院校学生实行总罢课，中学生也参加进来。运动迅速推向全国。5月7日，上海学生和各界人士两万多人集会抗议。9日，是袁世凯接受日本“二十一条”的国耻纪念日，上海许多学校停课一天，娱乐场所停止营业一天。6月5日，上海日资棉纱厂工人带头，许多行业工人店员罢工、商人罢市，这是史无前例的大事。全国各地纷纷举行了罢课罢工罢市。

像五四运动这样席卷全国、具有如此规模和声势的爱国群众运动，在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这是一场广大群众参加的爱国救亡运动。拿它同甲午战争失败时康有为等一批举人“公车上书”请求代奏的温和态度比一比，就会发现时间相隔只有二十来年，而中国的社会状况和民众觉悟程度已经发生多么大的变化！它也使许多原来因辛亥革命的结

局而陷于极度苦闷中的中国先进分子看到在人民群众中竟蕴藏着如此排山倒海的巨大力量，看到了中国复兴的希望所在。要改造社会，只有依靠民众才能实现。如果只靠少数人的呼吁，没有广大民众的奋起投入，力量自然十分单薄，不足以战胜强大的旧势力。这是中国近代历次变革失败的根本原因。中国同盟会的老会员吴玉章回忆自己在五四运动时的强烈感受：“这是真正激动人心的一页，这是真正伟大的历史转折点。从前我们搞革命虽然也看到过一些群众运动的场面，但是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种席卷全国的雄壮浩大的声势。在群众运动的冲击震荡下，整个中国从沉睡中复苏了。”“在人民群众中所蕴藏的力量一旦得到解放，那才真正是惊天动地、无坚不摧的。”“当时我的感觉是：革命有希望，中国不会亡。”

五四这样惊人大风暴的袭来，又使大批爱国志士短时期内在思想上发生剧烈的变动。不少原来因革命陷于低潮而过着苦闷孤寂生活和平素只生活在宁静的个人小圈子里的人群，一旦积极投身到这场火热斗争中后，发现在自己周围还存在一个更广阔的天地，心情再也无法平静下来，再也无法回到过去那种生活中去。他们不是停留在一时的激情和狂热，而是和运动中结识的志同道合者一起，经常严肃地共议国事，一见面谈得最多的是，经过反复比较、探寻，究竟哪一种新思想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前途问题。在新生代的知识青年中出现了有毛泽东、蔡和森等的新民学会，有周恩来、邓颖超等的觉悟社，有恽代英、林育南等的利群书社等团体。随着传播新思想的报刊图书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版和广泛发行，新思潮传播影响到许多中小城市，已有相当大的群众性。他们目光更加开阔，接触到更广阔的社会，提出要把“小我”融于国家民族的“大我”之中，投身到实际的社会活动中去，谋求国家民族的复兴。许多早期的共产党人就是从这些人群中走出来的。这样成千上万的人在短时间内出现的思想大变动，是平时多少年也难以做到的。

第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在列宁领导下，俄国爆发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使社会

主义从理想变为活生生的现实。它在最初由于消息闭塞混乱而没有立刻被很多中国人所理解。但真相逐步传开，苏维埃政权的内外政策和施行情况更加具体地常常见于报端。一些先进分子如瞿秋白以记者身份到苏俄考察，写回不少生动翔实的报道。1918年年终欧战结束时，李大钊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文章中，热情洋溢地写道：“社会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一七八九年的法国革命，是十九世纪中各国革命的先声。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欧战酿成的悲惨情景和巴黎和会上赤裸裸的强权政治，使许多人看到西方社会存在的黑暗面，并不像他们原来所想的那样完美无缺，难道中国还要步他们的后尘，再沿这条老路重走一遍？为什么不能改弦易辙，采纳世界上更新的学说，创造一个更合理的社会？从反对封建旧礼教到向往社会主义，自然地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潮流。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进行的，自然引起更多中国先进青年对马克思主义的关心。1919年，曾在日本留学时受到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影响的李大钊又分两期在《新青年》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关于“唯物史观”、“经济论”和“社会主义运动论”的基本原理。一些报刊纷纷发表了许多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开始成为中国先进思想界的主流。这是五四运动在中华民族解放史中带来的最重要成果。

但人们要真正系统地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并不容易。在1920年以前，马克思、恩格斯主要著作的中文全译本几乎没有，列宁的文章连一篇译成中文的也没有。能直接阅读外文书籍的人那时并不多。邓颖超回忆道：“在‘五四’那年的夏末……大家都还没有一定的信仰，也不懂得共产主义，只听说最理想的社会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只知道有列宁，苏俄十月革命成功了；只知道他们的革命是把多数被压迫者解放了，要实现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引起了我们的同情和对十月革命的憧

憬。”这在先进人们初接触马克思主义时是自然的现象。但他们不满足于那些间接介绍或粗线条的了解，需要更多的理性思考，需要更系统的学理指导，便转向和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一起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1920年，从日本留学归国的陈望道翻译出版了全本的《共产党宣言》。从1920年9月起，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成为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中心的刊物。先进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有了比较明确而系统的了解，并且开始从事工人运动。中国社会生活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

初期新文化运动的队伍在这时出现明显分化。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陈独秀、李大钊等和胡适等自由派知识分子走上不同的道路。双方发表文章，在公开论战中阐述各自的观点。

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并不是抛弃了初期新文化运动提出的“民主和科学”的旗帜，而是赋予它们以新的更加完整的内容。中国民众的绝大多数是工人和农民，如果不到他们中间去，不充分考虑他们的利益和关心的问题，只把眼光停留在少数知识分子的狭小圈子里，那么，不管对民主的议论如何激烈，依然只是一部分人甚至是少数人的民主，谈不上真正广泛的人民民主。科学，最根本的是要符合客观实际，必须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的土壤中，脚踏实地地找到推进中国社会变革和进步的办法。这自然比关在书房或会议室中高谈阔论要艰苦得多。可以说，经过五四运动，人们对民主和科学的认识，比以前更深刻、更切合实际了。

毛泽东在1939年写道：“二十年前的五四运动，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以后，他又写道：“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

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组织起来才有力量，才能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理想。1920年，李大钊在北京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它们的成员大多成为早期的共

产党人。接着，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开始在北京、上海、湖北、湖南、山东、广东和留日、留法学生中相继建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五四运动，以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追求救国强国真理的进步性、各族各界群众积极参与的广泛性，推动了中国社会进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为新的革命力量、革命文化、革命斗争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条件。

这是一个新的起点，是对五四运动应有的历史定位。

整整100年过去了。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结合五四运动以来100年的历史，深入研究五四运动倡导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思想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大意义，把研究五四精神同研究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统一起来，同研究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统一起来，使之成为激励人民奋勇前进的精神力量。重温100年前五四运动前后这段历史，我们不能不为先人们在中华民族处于如此险恶境遇中那种不屈不挠、顽强奋斗的精神深深感动，也强烈感受到中国人终于找到马克思主义同本国实际相结合，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光明大道并不断发展是多么不易。100年来，中国人为了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顽强地探索和奋斗，做过多种多样的尝试，一再想照抄照搬别国的经验和模式，特别是曾力求向西方国家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实践告诉我们，别的路都不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一条唯一正确的道路，也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使命，需要一代接着一代人的持续奋斗。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今天，就必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永不停步地开拓前进。

（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原文刊载于《求是》杂志）

长征中博古交权的“鸡鸣三省”石厢子会议

颜 林



“鸡鸣三省”石厢子会议会址。颜林/摄影

毛泽东曾经运筹帷幄、开会过年的地方——红军长征纪念地“鸡鸣三省”石厢子会议旧址，目前尚存无数红军标语、遗迹和遗物。为了追寻革命遗址遗迹，我们一行数人从四川省革命老区叙永县城驱车前往四川省中共党史教育基地、红军长征纪念地“鸡鸣三省”石厢子会议旧址。长征途中，党中央红军在叙永县石厢子彝族乡“鸡鸣三省”石厢子举行的“鸡鸣三省”石厢子会议，是遵义会议的延续，历史意义非同凡响。我们在“鸡鸣三省”石厢子会议旧址瞻仰红军长征的遗迹和遗物，缅怀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与当地老乡一起摆当年毛泽东在石厢子运筹帷幄、开会过年的故事和“鸡鸣三省”石厢子会议时“博古交权”的故事，引起对这位中国历史上的伟人和红军的无限怀念。

石厢子，位于川南门户叙永县城南79公里处（为今石厢子彝族乡政府所在地），濒临赤水河畔，南与贵州七星关区毗邻，西与云南威信县接壤，“雄鸡报晓，三省可闻”，故有“鸡鸣三省”之称。1935年2月3日（甲戌年腊月三十）晚至2月5日（乙亥年正月初二）凌晨，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在此召开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鸡鸣三省”石厢子会议。作为遵义会议的延续，“鸡鸣三省”石厢子会议在党史军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2014年中央红军“鸡鸣三省”石厢子会议旧址被命名为“泸州市中共党史教育基地”，2015年又被命名为“四川省中共党史教育基地”。2016年12月19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宣部、财政部、旅游局、教育部、教育部、民政部

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文化部、民航局、民航局、文物局、铁路总公司、文献研究室、党史研究室等14个单位发出《关于印发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的通知》（发改社会〔2016〕2662号文件），叙永县“鸡鸣三省石厢子会议旧址”入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

红军进驻石厢子

石厢子四面环山，古木参天，怪石嶙峋，地势险要，一块形似箱子的巨石矗立场头，因而命名为石厢子。红军进驻时，这是一个居住着包括汉族、彝族、苗族等在内的75户人家400多人的村落。沿着石厢子左侧陡峭的山谷坛子口而下，就是赤水河上游的大渡口。

1935年1月29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率领中央红军在川黔交界土城、猿猴（元厚）场一带一渡赤水，进入川南的古蔺、叙永地区，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进入四川境内。

2月3日拂晓，毛泽东等率领中央纵队从摩泥向石厢子进发，经安基屯、东瓦沟、阿里普，下午5时许抵达石厢子。当地彝、苗、汉等各族群众扶老携幼、箪食壶浆迎接红军。红军总部、电台、没收征发委员会、银行等均驻扎于此。根据军部安排，红军总部驻万寿宫；电台设在老乡刘春和、刘会元、陈文中家；中华苏维埃银行设在老乡袁继武、彭海家；没收征发委员会设在老乡王连山家；苏维埃纸币兑换处设在五圣宫；毛泽东住在老乡肖有恩家。

毛泽东有一个习惯，每到一地，总喜欢找书找报，以便了解当地历史掌故、诗词歌赋和风土人情等，并通过报纸上的报道，了解一些国内和国际形势变化，间接掌握一些敌人的情况。当时不可能在偏僻的石厢子马上找到报纸和地方史志书籍，于是，毛泽东派人去请了一个熟悉情况的当地“私塾”先生来详细询问情况。

当晚，中革军委在石厢子召开会议，研究作战方针和行动计划。19时，军委发出《关于我军四日

行动部署》电令。作出如下部署：“我野战军仍执行2日24时电令任务，各兵团明日行动如次：A、右纵队全部由林指挥，应进到古宋金鹅地域，并相机占领古宋城，向永宁、江安、江门方向警戒。B、三军团应进到兴文地域（最好不经古宋）并准备相机占领兴文城，向永宁方向警戒。C、五军团应由摩泥（尼）（摩尼又名金尼）向西进到石厢子地域。D、军委纵队进到水潦地域。”

鉴于一军团二师围攻叙永县城不下，各路敌军又向叙永合围，军委于当晚22时向各军团发出《我军向分水岭等地前进及四日战斗部署》电令。部署：“我野战军为迅速脱离当前之敌并集结全力行动，特改定分水岭、水潦、水田寨、扎西为总的行动目标”，“军委纵队明日仍在石厢子不动，准备开水田寨、扎西之间的地域”，“第五军团应开到摩泥（尼），并以得力的团警戒永宁，以掩护一军团主力通过”，“一、九两军团及军委三、二梯队，应于明4日以急行军通过永宁、摩泥（尼）之线”。当晚24时，军委又发出《三军团派团分别扼守站底、两河口，五军团扼守摩泥（尼）以北防永宁敌南进》的电令。命令：“五军团扼守摩泥（尼）以北的要隘，阻止永宁之敌南进，直至明晚，以便掩护我右纵队通过站底、摩泥（尼）之线向川滇黔交界之扎西地域集中”，“李、黄、陈、刘各以急行军于明日拂晓通过永宁、摩泥（尼）之线，并于到达指定地域向永宁严密警戒”。红军向敌人兵力空虚的川滇边境转移，待机由扎西（威信）出长宁在宜宾附近北渡长江。

当日，时任军委三局政委的伍云甫^①在日记中写道：“2月3日，晴，由达摩泥（尼）经安吉亭（安基屯）、乐洼（东瓦）沟，到石乡（厢）子宿营，没收彭姓土豪（是日即旧历除夕日——三十日）。”伍云甫还在前一天的日记中写道：“2月2日，阴。由（8时）马蹄滩经张家坝、海螺铺（堡）、千水桥到达摩泥（尼）宿营（23时30分到达）。越六座高山。（约80里）”^②

当天，时任红五军团参谋长的陈伯钧^③也在日记中写道：“2月3日，始阴、继晴、微风，行军

——由风水桥经磨泥〔尼〕到石厢子。约75里。9时出发，因吃饭关系又挨晏了（即又晚了）！结果仍掉在野战医院后面，及至磨泥〔摩尼〕才插上第四科，到石厢子已晚间20时许了！”陈伯钧还在前一天的日记中写道：“2月2日，阴、夜雨。行军——由马头经海螺铺到风水桥，约75里。9时由马头出发。而我们伙夫起床太晏，弄得不能按时赶上队伍，真是一个很大的缺点。到海螺铺遇靖匪中途扰乱，打了数十枪。但我们在武装掩护之下，仍安全通过该地。晚21时许才到达宿营地。”^④

打土豪过“开心年”

时逢春节将至，红军在石厢子积极进行宣传活动，书写革命标语，开展群众工作。2月4日（乙亥年正月初一），红军在石厢子召开群众大会，将从恶霸地主彭正楷、周世成家没收的粮食、衣服等分给贫苦群众，并处决了民愤极大的税卡员肖宝之。在吴家桥，红军宰杀团总吴联山家的肥猪，与当地群众聚餐，共度新年。几十年后，当地老人仍津津乐道与红军一起过的这个“开心年”。红军为民除害，接济穷人，深得民心。此后，红军四渡赤水两次往返于“鸡鸣三省”四川一侧，均畅通无阻。

终年辛苦而不得温饱的“干人”，分得粮食、衣服等财物，与红军一起过了一个“开心年”。川南地区的穷人之所以叫“干人”，是因为他们终年辛勤所得全被军阀、地主豪绅抢夺去了，他们的血被吸血鬼们吸干了。有的人家穷到连十七八岁的姑娘都没有裤子穿，小孩子在冬天仍一丝不挂，蹲在路边冻得发抖。有的连破烂不堪的衣服也穿不上，勉强把下体遮盖一下，只能用稻草、棕树叶编成的蓑衣披在身上。到了冬天，又只有盖稻草编织的被子。至于吃的，广大川南穷人过着“三月杂粮三月糠，三月野菜三月荒”的日子。

美国著名记者、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中记述了朱德总司令长征时期的往事。她写道：“在朱将军保存的有关这一时期的记

录中，我发现了许多潦草的铅笔笔记，显然是他在村子里休息时，或是在深夜临睡前匆促记录下来的。有一页笔记提到一月十五日在遵义举行过群众大会，他在会上讲了话……另外几页笔记显示出朱将军对人民生活问题的不间断的关怀。有一处写道：玉米和少量的白菜是老百姓的主要食物。老百姓穷得吃不起粮食，只能卖粮付租付高利。军阀还抢米，算作‘战时粮税’……老百姓管地主叫‘绅粮’，自称‘干人’——什么东西都被抢干了。三种盐，阔人吃白的，中等人家吃褐色的，劳苦大众吃黑盐巴。农民就连黑盐巴也吃不起，放一小块在碗里，吃菜的时候就把菜在盐巴上沾一下。”^⑤

陈伯钧在日记中，如此描述当时的情形：“2月4日，晨雾、继晴，休息——石厢子。石厢子系川、滇、黔三省交界处，处于万山中，四周岗峦环绕，形势险要。不过给养比较缺少，连水都不易找到。这两日系旧历年关，豪绅们物质都很丰富地准备过年，我们住的房主恰是一土豪，我们也就将土豪所办的年货给自己过年用了！今日伤口又比较好些，微可以行走一下，因此我亦到王主任（即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及第四科（即中央军委四局四科）等处玩了一玩。”

毛泽东在石厢子开会过年 洛甫代替博古负中央总责

2月3日晚至2月5日凌晨，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在“鸡鸣三省”石厢子连续多次召开会议。2月4日18时，野战司令部向各军团发出《野战军司令部关于川南敌军部署情报致各军团电》，通报了川南敌军兵力部署的情况，部署灵活机动应对敌军。原来，红军在长征途中，军委二局已经掌握了敌军的密电码，因此通过破译敌军的密电码，掌握了敌军的兵力部署等重要情报。所以，在长征途中，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运筹帷幄，指挥红军作战略转移，才没有遭到敌军的埋伏，这是蒋介石至死都没有搞明白的事情。敌军的密电码是中共隐蔽战线的地下党组织，想方设法才搞到的。当时，毛泽东特别喜



“鸡鸣三省”石厢子会议会址。颜林/摄影

欢的年经战士钱江（钱昌鑫）就在军委二局三科当报务员（侦收员），从事侦听敌人电台的技术侦察工作。毛泽东曾多次了表扬军委二局的工作，称赞说：二局是“走夜路的灯笼”，我们是打着这个灯笼长征的，没有二局，长征是很难想象的。^⑥

2月4日23时半，军委又向各军团发出《关于我军五日行动部署》。对各军团2月5日的行动部署是：“（一）第一军团以集结扎西之目的其行进路线：子、军团直属队及二师之一部应由大坝直开往扎西。丑、第二师主力及第三军团跟九军团二、三梯队后，由两河口经黄泥咀（坭嘴）、分水岭开往扎西，以上两路由林定出各宿营地。寅、一师主力如已到沙坝场时则即经石厢子进到檀场（坛厂），但须于明日14时前，全部通过石厢子。（二）第三

军团应由清水河，黄泥咀（坭嘴）、海坝地域开往水田寨或扎西之西北地域。（三）第五军团应进到石厢子宿营。（四）第九军团及军委二、三梯队应进到分水岭宿营。（五）军委纵队应进到水田寨宿营。”同时，要求“各兵团都应加强对古宋、永宁、站底各方的后侧卫及驻址警戒”。从军委发出的上述电文电令，可以看出由于当时军情紧急，不仅会议研究的内容很多，而且会议是十分紧张和繁忙的。

在石厢子，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中央领导，用开会的形式度过了长征途中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新年。这是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度过的唯一一个春节。作为遵义会议的延续，石厢子会议有以下三个议题：议题之一是讨论中央红军的行动方针；议题之二是讨论中央苏区的问题；议题之三是研究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这次召开的“鸡鸣三省”石厢子会议，堪称长征路上的“小遵义会议”。2月5日凌晨，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洛甫（张闻天）代替博古（秦邦宪）负中央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之为总书记）；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此时中共中央已经与共产国际^⑦失去了联系，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决定了中共中央总负责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和中央红军的战略方针以及中央红军的行动部署等重大事项。

当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何克全）在背后叫博古不要交“权”，博古没有听，他服从政治局多数人的决定，把几副装有中央重要文件、记录、印章的挑子交给张闻天。从此，就开始了张闻天在党内“负总责”的时期。张闻天虽然犯过“左”倾错误，但是在遵义会议的酝酿和召开的整个过程中，他都密切地配合了毛泽东，对促进会议的召开并取得成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据此也就可以理解会后为何由他来代替博古的职务，这正如张闻天在笔记中所说的，“当时政治局许多同志推举我当书记”，我“被抬出来代替了博古的工作”。这显然与张闻天对会议所作的贡献有关。

在石厢子，周恩来与博古进行了一次长谈，被称为“周博长谈”。遵义会议上严厉批评博古，推举毛泽东参与中央核心领导，这是博古未曾想到的。对此，博古一直想不通。在红军一渡赤水到达石厢子村子时，周恩来同博古有一次长谈。周恩来的谈话推心置腹，大意是：我们党必须找一个熟悉农村革命的人当统帅。我虽然长期做军事工作，但我有自知之明。你虽然有才华，但不懂军事，很难领兵打仗。你和我都是做具体业务的人，不合适做领袖，当统帅。毛泽东擅长农民运动，经过井冈山斗争，总结出打游击战、运动战的经验，很适合驾驭目前的战争，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帅才。宁都会议后，他离开了军队，但红一方面军不能没有他。从长征开始，我就在想办法让他尽快回到军事领导岗位。我深信，以他的才能，一定能率领红军走出困境。所以在遵义会议上我力主他进入政治局常委，参与军事领导。你的讲话不检讨军事路线错误，遭致很多人不满，是因为大家憋了一肚子话要说。希望你能支持我，抛弃和老毛的前嫌，同心同德，一切为了打败蒋介石，建立无产阶级新政权这个大局。周恩来要博古“抛弃和老毛的前嫌”，“同心同德”，“一切为了打败蒋介石”，“建立无产阶级新政权”，这是多么高尚的情操，多么博大的胸襟！正因为周恩来的这一席推心置腹的谈话，使博古解开了思想疙瘩，服从革命事业的需要，顺利实现了史称的“博洛交权”，张闻天成为党中央的一把手。博古不仅将中央大权交给洛甫，而且此后一直心悦诚服地听从毛泽东的军政指挥。

据周恩来后来回忆：中央红军一渡赤水向云南扎西行军途中，洛甫首先提出中央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毛泽东找周恩来商量，把洛甫要求变换中央领导的意见告诉了他。周恩来毫不犹豫地：“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泽东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⑧

根据敌情的变化，2月5日凌晨3时，中革军委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从石厢子向各军团发出《我野战军目前方针在集中全力于长宁以南及西南进行渡金沙江侦察》电令。部署：“我野战军目前方针在

集中全力于长宁以南及西南地域争取休息，进行渡金沙江之侦察，在渡江不可能时，即留川滇边以机动。”命令：“一军团不必到扎西，应由现地域改向长宁西南适当地域集中，进行路线及地域由林自定，但不得经两河口”，“三军团依彭、杨昨4日17时来电，向大坝山以南西进，但应避免走一军团在同一路上运动”，“九军团及军委二、三梯队仍向分水岭前进不变”，“各军团仍应以急行军超过敌人，由两河口向我追击的范围，在行进中应加强对两河口侧后卫和警戒掩护”。

2月5日凌晨6时，石厢子会议结束。此刻，石厢子村庄里响起一声鸡鸣。雄鸡报晓，一唱百应，此起彼伏，三省可闻，韵味无穷。由于会议开得十分顺利，毛泽东精神饱满，毫无倦意。当毛泽东听到“喔……喔……”的鸡鸣声时，激情满怀，感慨万千：雄鸡一唱天下白，在“鸡鸣三省”石厢子用开会的形式过新年，过得太有意义了，真是没有枉过啊！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只打了一个盹，就忙着吃早餐。上午10时许，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一行告别石厢子的汉、彝、苗等各族群众，转入云南省扎西（威信县）境内。

当日，伍云甫在日记中写道：“2月5日，晴。由石相〔厢〕子出发，经水田寨，团匪据炮楼二座扰乱，绕山道，至花屋〔房〕子宿营，路甚难行（3里路行了约3小时），23时半才到。与二科合住房子。”^⑨陈伯钧也在日记中写道：“2月5日，阴、微雨。行军——由石厢子走小路到水田寨，行程75里。（入云南境）水田寨系云南地境，有滇军一营守之，我军准备相机消灭之。但至晚间与敌仍相持不下，因敌固守碉堡，不能立即攻克，造成对峙形势。是日，我的担架在途中掉队十余里，晚间弯过敌堡又连跌十余跤。这是有病坐担架以来第一次遇到的特殊困难情境，运输员们均疲惫不堪无能为力了！到宿营地时已次日2时了！”^⑩

2月9日，红军各部均进抵扎西地区。敌人各路追兵抵达叙永时，扑了一个空。



鸡鸣三省会议陈列馆（全景）。颜林/摄影

亲历者忆“鸡鸣三省”石厢子会议

对石厢子会议，不少亲历者都有生动回忆。比如，周恩来在《党的历史教训》一文中说：“从土城战斗渡了赤水河。我们赶快转到三省交界即四川、贵州、云南交界地方，有个庄子名字很特别，叫‘鸡鸣三省’，鸡一叫三省都听到。就在那个地方，洛甫才做了书记，换下了博古。”^①

张闻天夫人刘英在《长征琐忆》中谈到：“关于党中央组织领导问题，遵义会议决定由常委分工解决。到2月5日在‘鸡鸣三省’这个庄子里，常委分工才决定由闻天接替博古负总的责任（习惯称为总书记）。当时凯丰还在背后鼓捣，叫博古不要交权，所谓‘交权’，就是把几付装有中央重要文件、记录、印章的挑子交出来。博古没有听他的，还跟凯丰说，应该服从集体的决定。这样他就把权交给了闻天，那几付挑子，就跟闻天走了。”^②

钱江少将《长征中中央军委行军日程回忆》一

文记载：1935年“2月1日到（古蔺）马蹄滩；2日到摩泥（尼）；3日到（叙永）石相（厢）子（鸡鸣三省），留驻一天；5日到水田附近花屋（房）子；6日到石坎子，留驻一天；8日到院子”。钱江在此文前言中说：“为了缅怀长征的光辉历程，我与许多老同志通过认真回忆，反复探讨，并参照有关日记、文章、资料等，在一份五十万分之一的地图上标出了长征中中央军委的行军日程……长征时我在军委二局作技术侦察工作，由于工作关系，在长征的全过程中，一直跟随着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行动，从江西到陕北，没有中断过。”

毛泽东也讲过“鸡鸣三省”会议。毛泽东谈及“鸡鸣三省”会议时，曾说：“1935年1月党的遵义会议以后，红军第一次打娄山关，胜利了，企图经过川南，渡江北上，进入川西，直取成都，击灭刘湘，在川西建立根据地。但是事与愿违，遇到了川军的重重阻力。红军由娄山关一直向西，经过古蔺、古宋诸县打到了川滇黔三省交界的一个地方，

叫做‘鸡鸣三省’，突然遇到了云南军队的强大阻力，无法前进。中央政治局开了一个会，立即决定循原路反攻遵义，出敌不意，打回马枪，这是当年二月。”

关于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的职务问题，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在《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中指出：“周恩来同志回忆博古同志交出职务的情况时说：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博古再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人服了’。当时部队行进到四川、贵州、云南交界的地方，在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庄子里，‘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毛主席‘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⑩

石厢子会议是遵义会议的延续，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性作用，历史意义非同凡响。石厢子会议研究决定了三件重大事情：一是讨论和研究了中央红军的行动方针，部署红军作战略转移，从而摆脱了敌人重兵的围追堵截。二是讨论和研究了中央苏区今后的行动方针等问题，为中央苏区以后的斗争指明了方向。三是根据遵义会议精神，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了分工，决定博古（秦邦宪）交出党中央的最高领导权，由洛甫（张闻天）接替博古（秦邦

宪）负中央总的责任，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张闻天在党内负总责，保证了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指挥，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之后召开的石厢子会议和随后召开的扎西会议，完成了中央总负责人领导权交接，调整了中央红军的行动方针和战略部署，制定了中央苏区今后的行动方针，讨论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传达了“遵义会议决议”，纠正了“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军事路线，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和全军的领导地位。同时，作出了“回兵黔北”和“缩编部队”的决策，缩编了中央红军各军团，充实了一线战斗部队，减少了部队的行装；成立了中共川南特委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打击和牵制敌人，配合中央红军作战，策应中央红军“回兵黔北”的战略行动。

瞻仰红军长征纪念地——“鸡鸣三省”石厢子会议旧址，缅怀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得《四渡赤水》诗一首。诗云：“运筹帷幄石厢子，四渡奇谋敌胆惊。北上挥师驱日寇，三军会合聚群英。”

（作者单位：泸州市叙永县人民政协）

参考文献

① 伍云甫，湖南省耒阳县人。1923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长征期间，伍云甫历任中央军委三局政委、中央军委二局政委、中央军委第二政治处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担任中国人民救济总会秘书长、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卫生部副部长、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常委等职。

② 《红军长征日记》，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

③ 陈伯钧，四川达县人，1926年冬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翌年夏，参加讨伐夏斗寅叛军的战斗，在前线加入中国共产党。长征中任红五军团参谋长，率部为中央红军殿后，有“铁屁股”之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院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④ 《红军长征日记》，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

⑤ 《伟大的道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湖南人民出版社重印，1979年4月第1版，第358页。

⑥ 从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江西苏区，到1935年10月长征结束，据二局破译科副科长邹毕兆在长征途中的亲笔记录显示：二局破译科在险恶的战争环境中，相继破译了180余种密码。地图上曲折的长征路线，也是二局情报的写照。敌人哪儿强哪儿弱，哪儿可以通过，都是靠二局提供的情报。

⑦ 第三国际又名共产国际，列宁领导创建，存在于1919～1943年，总部位于莫斯科，是一个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组织的国际组织。1922年7月，中共二大正式决定参加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第三国际成了中共的实际领导者。

⑧ 《毛泽东年谱》，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46页。

⑨ 《红军长征日记》，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

⑩ 《红军长征日记》，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

⑪ 《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1期。

⑫ 《党史资料征集通讯》1986年第10期第17页。

⑬ 《党史资料征集通讯》1985年第1期。



改革开放是发展内陆德阳的关键一招

中共德阳市委党史研究室

德阳是中国农村改革的策源地之一，是较早走出国门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的地区之一，是顺应我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和因国家大工业建设基础而建立的四川第一批地级市，是因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县域经济而闻名的城市，是依托新区建设进行大开发大开放的城市之一，是入世后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城市之一，是在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中进一步提高开放程度的城市之一，是国家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之一，是“一带一路”重要供应商。40年改革开放历史证明，改革开放是发展内陆德阳的关键一招。放眼未来，因改革开放崛起的德阳必然因改革开放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一、40年改革开放实践，德阳走出一条从贫穷到小康、从闭塞到开放的内陆城市崛起之路

物不因生，不革不成。德阳地处四川盆地的成都平原与川中丘陵交接地带，既不沿边，又不靠海，是典型的内陆地区，没有通江达海的地缘和人文优势，也没有经济特区和沿海开发区的优惠政策，但我们始终坚持以改革开放为统领，不断探索不沿边不沿海中西部内陆地区加快经济发展的路子，趟出一条农业占主导向工业化城市化迈进、闭

塞向开放蜕变、贫穷向富裕转变的内陆地区崛起之路。40年弹指一挥间，我们用双手书写了德阳发展的壮丽史诗，创造了让人惊叹的德阳奇迹。大变则大效，40年改革开放，德阳大地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经济总量从1978年10.2亿增长到2018年预计突破2100亿元，增长约205倍，由全省第6位跃升到第3位，年均增速达10.1%；人均GDP由1978年311元人民币增加到2017年8236美元，跨入中等偏上收入水平；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由1983年的不到2亿元增加到2017年102亿元，增长53倍，年均增长10.07%；产业结构从一二三蝶变为二三一；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2017年为31609元，是2000年的4.65倍；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17年达到15207元；公路里程从建市之初的1981公里到2017年8224.6公里，大件路、成绵高速、成德动车公交化等一大批交通设施建设把德阳人从“双脚丈量”带到“抬腿上车”；全市实现县县有高校，各类社会保险参保率超过91%，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费报销比例超过75%。郡县富则天下富，40年改革开放，德阳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独树一帜、成效明显：从四川省1994年开始评“十强县”以来，24届中，旌阳17次上榜，广汉14次上榜，什邡16次上榜，绵竹市14次上榜；2018年市委八届

七次会议提出实施县域经济提质升位行动，明确支持广汉3年、什邡和绵竹5年重返全省十强县，旌阳、罗江、中江升位晋位，再铸县域经济新辉煌在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中紧锣密鼓展开。有容则乃大，40年改革开放，德阳书写了冲出盆地、汇入全球的开放华章：2017年，德阳完成进出口总额104.01亿元，进出口总量连续多年居全省前列，产品遍布世界137个国家和地区，重装产品遍及“一带一路”沿线27个国家。全市外商投资企业135家，居全省第二，其中境外世界500强企业16家。中欧班列德阳现代物流港成为“德阳造”销往海内外的大通道。成德同城、成绵一体实现建成城际半小时经济圈，“凿空”借船出海、通江达海通道。

40年后的今天，德阳不仅是四川的德阳、中国的德阳，更成为世界的德阳。铸锻钢制造基地世界最大、发电设备产量雄居全球第一、石油钻机出口量全国第一、雪茄烟生产基地亚洲最大，是中国重大装备制造业基地、联合国清洁技术与再生能源装备制造业国际示范城市、全国职教基地、中国名酒生产基地、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森林城市。经济总量中西部城市排名36，西南地区排名第6，四川排名第3；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西部排名第4；综合经济竞争力排名位列四川第2，一个富裕开放的内陆城市在新时代正阔步向前。

二、40年改革开放实践，德阳形成一批敢为人先、勇立潮头、可复制可推广的内陆城市崛起经验

革而化之，与时宜之。40年间，国家和省多次把改革试点赋予德阳，德阳不负重托，创造经验得到推广和复制。广汉金鱼创造的包产到组成为四川农村改革的发端，与安徽小岗一样是中国农村改革的策源地之一。广汉向阳人民公社改挂出向阳乡人民政府的牌子，成为全国第一个取消人民公社的地方，向阳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第一乡，全国人大调研后给予充分肯定。德阳建市后把战略重点放在农

村的同时，丝毫不放松城市经济改革发展，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中率先在四川推行企业承包责任制、厂长负责制，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利改税和企业自负盈亏、探索企业兼并联合，企业效益得到很大提高，改革首创在四川推广。1992年省委把德阳列为四川省综合改革试点市，2007年确定德阳为四川开展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市，2007年7月，四川确定德阳实施扩权强县试点，2010年教育部批准德阳为全国唯一高等职业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担负的一项项改革试点对四川和全国的改革起了探路的作用、示范的作用和样板的作用。2015年德阳被国家确定为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德阳坚持把全面创新改革作为“一号工程”，通过一系列创新举措的实施，形成创新装备制造高端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模式等多条成熟经验，推动智能制造集群化加快经济转型升级经验受到国务院通报表扬；探索大型国企改革扭亏脱困“中国二重模式”经验被最高人民法院列为10大典型案例；探索专利权质押融资贷款模式通过国务院常务会审议，并在全国推广；德阳发展职业教育经验入选四川改革转型发展10大典型案例。

因而能革，天道乃得。40年德阳改革开放深刻启示我们：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方向，在中央和省委坚强领导下，确保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为改革开放提供组织保证；必须坚持问题导向，通过警示老办法行不通迫使我们进行创新；必须坚持解放思想，把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贯穿到推进改革开放的全过程，冲破旧思想、旧观念、旧体制、旧制度、旧办法的束缚，破解改革发展难题，提高改革发展能力；必须坚持干部自觉担当，把担当担责压紧压实；必须坚持尊重群众和基层首创精神，把基层群众蕴藏的改革动力和创新智慧充分发挥好。

三、新时代再出发，打造改革开放高地，展现一个走向全国、面向世界高质量发展的内陆德阳更加美好的未来

今美于昨，明日复胜于今。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2018年春节前夕习近平赴四川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要求四川打造“内陆开放高地”。市委八届七次全会提出打造“四张名片”，其中之一就是“改革开放高地”，这对德阳改革开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实践证明，过去40年中国经济发展是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德阳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改革开放条件下进行。一要弘扬敢为人先的改革创新精神。虽然我们已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要不断跋山涉水。处在新的历史方位，德阳改革发展面临着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新时代再出发，建设更加美好德阳仍然有许多重大课题需要探索实践，有许多新的领域需要开拓创新。唯有继续弘扬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改革精神，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才能激发改革开放的强劲动力。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德阳要始终站在改革开放最前沿，扛起历史责任，弘扬敢为人先精神，顺应国际国内形势，牢牢握住经济全球化不同发展阶段的重要战略机遇，宵衣旰食、傲霜斗雪，推进改革开放，为全省全国提供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为全省全国树立改革精神新标杆。二要蹄疾步稳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要推进夯基垒台、立柱架梁改革，发挥比较优势和潜在优势，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军民融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等重点领域改革取得突破，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德阳经济高质量发展和转型升级。三要以全球视野推进开放。要跳出德阳发展德阳，以全球视野的开放倒逼改革，真正把德阳建设成世界的德阳。要着力构建开放通道，着力打造开放平台，着力培育开放主体，着力拓展开放渠道，着力创新开放体制，着力优化

开放环境，为内陆腹地变开放前沿打下坚实基础。要深化成德同城、成绵一体等区域合作，推动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格局，在全国扩大开放中建成支点、走在前列。四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增长，我们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推进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智慧力量，从群众普遍关注、反映强烈的事情做起，从群众不满意的地方改起，着力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现实的现实利益问题，增进人民福祉。五要书写好绿色发展改革开放新答卷。要抓好绵远河、石亭江、凯江“两江一河”等沱江上游生态修复治理，因地制宜打造绿色城镇带、特色产业带、美丽乡村带和文化旅游带，让绿色发展理念入脑入心，让绿色产业强市富民，让绿色城镇山水相融，让绿色家园美丽乡村人人向往，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的增长点，成为展现良好形象的发力点。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发展进步永无穷期，改革开放永不止步。新时代新起点，我们要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以高度自觉推进社会变革和自我革命，聚集各方智慧和力量，推动德阳的高质量发展，推进德阳改革发展再上新台阶，创造德阳人民更美好的生活，创造德阳更美好的明天。

（执笔人：马联松）



对邓小平农村改革发展思想的再认识

吉 勇

农村改革和发展问题是事关中国改革开放全局的根本性问题。邓小平时刻关注，始终把他放在改革的突出位置来抓。他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对农村改革和发展问题进行了探索，特别是在农村改革发展的关键时刻，旗帜鲜明的支持农村改革事业，高屋建瓴地设计农村改革的未来发展，取得了农业农村发展辉煌成就，为农业农村现代化释放了活力、注入了动能。

一、实事求是、顺势而为，审时度势调整农业经济政策

“文革”十年致使党和国家积弊甚多，由于长期受“左”的错误影响，人们思想僵化，积重难返。“文革”结束后，受“两个凡是”的禁锢，严重制约了人们生产积极性的提高，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致使中国经济社会徘徊不前，城乡居民生活非常清贫。

1977年11月，刚复出的邓小平到广州视察，当听说有些地方规定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问题时，引起了他的注意和深思，他把此事上升到国家政策的高度，指出：“看来最大的问题是政策问题，政策对不对头，是个关键。这也是个全国性的问题。”1978年2月，从缅甸回国后，他在成都听取四川汇报工作后说：“农村政策、城市政策，中央要清理，各地也要清理，零碎地解决不行，要统一考虑。”1978年9月，他对王恩茂讲：“全国调整农村经济政策，好多地方要恢复小自由，各地要从实际出发安排生产。”可以清晰看出在了解农村情况后，他认为农村改革

势在必行。

在他的倡导和推动下，当时从上至下形成了调整农村政策的呼声和氛围。1978年12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扩大生产队的自主权，指出：“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这个讲话精神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农村改革。也正是这个大背景，1978年11月，才有了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大包干的出现。邓小平后来讲，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农民的创造，毕竟是农民先实践了，但这个创造不是偶然出现的，是同当时调整农村政策大背景分不开，与一个伟大人物所起的作用分不开。正如万里评价：“中国农村改革，没有邓小平的支持是搞不成的。”

二、解放思想、因地制宜，旗帜鲜明支持农村改革事业

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事业是新事物，改革从哪里开始？具体怎么改？是需要探索和研究的大课题。在既无先例可循，也无经验可鉴的情况下，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大胆解放思想，激发干事创业的源泉动力，理清事关发展的内在逻辑，设计全局工作的有力抓手，这是中国农村改革得以成功的一条基本经验。

新时期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为什么会从农村开始呢？这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当时农村各种矛盾比较集中，大多数农民非常贫困，中国农业大国的国情决定了改革需要在农村率先取得突破。对此，邓小平也多次同外宾讲出了其中缘由。1984年6月30日，他说：“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农村

稳定不稳定。”1985年4月15日，他说：“工业的发展，商业的和其他的经济活动，不能建立在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贫困的基础之上。”“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二是中国农村有改革的历史经验。早在上世纪60年代，很多地方的农民就搞过借田渡荒、包产到户等生产责任制，后来虽被打压下去，但中国农民已探索出提高生产力的路子和农村改革经验，只要气候适当，说干就能干成。

第一，肯定包产到户。农村改革的主要形式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邓小平的肯定和支持才得以推开。限于当时认识局限，中央对农村经济政策如何调、调到什么程度并没有底。当大包干出现后，很多人接受不了，较长时间拿不到“准生证”，党内许多人对其排斥甚至否定，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拍板定案，不仅给生产责任制发了“准生证”，而且时刻关注并积极支持和肯定生产责任制，使它不断地丰富完善。

1979年6月，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万里向邓小平汇报安徽大包干情况。邓小平对他说：“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就实事求是干下去。”1980年1月，国家农委召开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出现1年多的大包干、包产到户仍是会议讨论的焦点。华国锋主持会议听取会议汇报后说：“责任制与包产到户单干不要混同起来”，“至于已经搞了的，还是要认真总结经验提高觉悟，逐步引导他们组织起来。”明显不支持大包干，认为包产到户与责任制不是一回事。会上，邓小平生气说：“对于包产到户这样大的问题，之前你们没有和我通气，思想毫无准备，我不好回答。”他不赞成华国锋的意见。在“双包”责任制发展和农村改革的关键时刻，1980年5月31日，他又发表谈话：“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旗帜鲜明地支持农村改革实践，起了打破思想僵化，推动农村改革的作用。

同年9月，胡耀邦主持召开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着重讨论加强和完善农村生产责任制问

题，会上仍有一些人不愿表态甚至明确反对，反对的、不表态的认为包产到户背离了社会主义道路。会上争论很激烈，有人甚至认为包产到户是资本主义“独木桥”，集体生产才是社会主义的“阳关道”。据杜润生回忆，“有一个书记拉着他的手说：‘包产到户’关系晚节，你不能晚节不保，不能搞资本主义啊”。包产到户是否违背社会主义性质？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不回答，包产到户就永远落不到户。1981年8月26日，邓小平明确说：“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制度下责任制的一种形式，没有剥削，没有违背集体所有制的原则，可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体现了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不是搞资本主义。”并且讲清楚了为什么不是资本主义，这个话可谓一锤定音，为全国农村改革指明了方向。1981年12月召开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会议形成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作为198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纪要明确地讲：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至此，包产到户等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得以正名，并迅速在全国农村改革中推开了，统分结合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充分发挥了集体优越性和个人积极性，逐步成为了全国农业生产的主要形式。如果没有邓小平对包产到户等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正确定性，大包干、包产到户等就悬着了，什么时候能实现，不可想象。

第二，尊重农民意愿。农村经济政策调整放宽后，农村改革在各地呈现出各种形式。当时安徽、四川等地率先搞的包产到户等形式的农村生产责任制改革受到很大争议，承受了巨大压力，1979年3月，国家农委召开七省三县农村工作座谈会，集中讨论“包产到户”和“包产到组”的问题。会议形成的纪要中虽然提出允许在一些特殊地区包产到户，但高层认识仍不统一。1980年4月2日，他同胡耀邦谈农业问题时指出：“我赞成政策要放宽，要使每家每户都自己想办法，多

找门路，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有的可包给组，有的要包给个人，这个不用怕，这不会影响我们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在这个问题上要解放思想，不要怕。”正是由于邓小平对农村改革有着深刻认识，充分尊重农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并将基层的有益探索上升到政策高度并加以推广，才为农村改革发展提供了活力和样板，这也是中国农村改革得以成功的基本经验。

第三，废除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是在毛泽东支持和倡导下建立起来的农村基层单元，人们习惯认为人民公社就是社会主义的重要象征，否定人民公社就是否定毛主席、否定社会主义，但在解放思想的大背景下，农村的改革形势已经冲击着农村人民公社制度这个禁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开，促使追求“一大二公”，实行评工计分、吃“大锅饭”的人民公社弊端更加凸显，经济基础的变化与上层建筑的改革极不适应。如果不及时改变这种状况，不冲破人民公社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束缚，农民已经高涨起来的积极性就可能重新受到挫伤，已经活跃起来的农村经济就可能受到窒息。邓小平认为人民公社是由于过去的农村政策走得太快而造成的失误，不是一个成功的、理想的试验。在他的大力主张和推动下，1980年，从四川省广汉县进行行政社分开的试验开始，到1984年底，全国完成了撤销人民公社，设立乡镇政权改革工作。人民公社的彻底废除实现了农村生产力发展的一次飞跃，也把中国农村改革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废除人民公社，实行生产责任制是不仅符合当时历史条件和社会发展规律的重要举措，体现了邓小平“实事求是”的精神品质，也符合邓小平打破平均主义，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想，这是在低生产力水平阶段的发展必然，需要长期坚持不变。

第四，支持乡镇企业。在农村改革实践中，中国农民还创造了另一种发展形式，即乡镇企业，这是农村改革中的意外收获，是未曾预料到的，它得益于邓小平的“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号召，也是他尊重农民首创精神的具体体现，使农村社队企业的发展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1983

年1月，中央印发《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明确肯定社队企业的合作经济性质，社队企业发展得到了政策支持。为适应撤社设乡需要，将“社队企业”更名为“乡镇企业”。在邓小平积极发展农村经济、推动农村改革大背景下，乡镇企业开始蓬勃兴起，“村村点烟，乡乡冒火”的“异军突起”景象，邓小平及时总结乡镇企业发展经验，认为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是转移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必由之路”。“一搞改革和开放，一搞承包责任制，经营农业的人就减少了。剩下的人怎么办？十年的经验证明，只要调动基层和农民的积极性，发展多种经营，发展新型的乡镇企业，这个问题就能解决。乡镇企业容纳了百分之五十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民不往城市跑，而是建设大批小型新型乡镇。”这些讲话精神促进了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活跃了农村经济，加速了农村改革进程和农业现代化步伐，使农业农村有了根本变革，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失衡的城乡关系，为城市工业改革提供了重要示范。

第五，提出“两个飞跃”。邓小平“两个飞跃”思想是经过农村改革长期探索实践和系统总结提炼而成的智慧结晶。核心内容是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和发展农村集体经济。1990年3月3日，邓小平在与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并在审阅中共十四大报告稿时重申：“农村经济最终还是要实现集体化和集约化。”

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两个飞跃”是有机联系并需要长时期发展的历史过程，体现了生产力发展水平处于不同时期的农村集体经济形式，既不能超前，更不能割裂。它阐明了我国农业发展的阶段性和具体步骤，指明了我国农业发展的根本方向和最终出路。为更好推进“两个飞跃”，邓小平还认为，依靠

农业政策调整只能解决一段时间的问题，农业的长远发展要靠科学，为此他又提出了“科教兴农”战略，重视农业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通过推动科学技术进步，增强管理能力，最终实现农村经济集体化和集约化发展道路。“两个飞跃”的农村改革发展思想，深刻揭示了农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关系，为农业农村改革改革发展事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整个中国农村面貌因此发生了根本改变，兴办农业合作社，公司+农户，公司+基地，合作社+农户，土地托管、代耕等好做法、好经验逐步涌现，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在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今天，仍然需要坚持和发展“两个飞跃”思想。

总之，农村改革的成功，极大地提振了改革开放事业的信心和决心，农民空前高涨的积极性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和农业增产增收，农民温饱和贫困问题的解决效果明显，从而奠定了战胜各种风险和稳定社会大局的基础，还为城市、工业、商业等各领域的改革积累了宝贵经验，对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进行了有益探索。

三、高举旗帜、持续深化，再创乡村振兴新辉煌

改革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旗帜，是推动农业农村发展的不竭动力，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由之路。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问题，党中央始终把推进拓展深化农村改革，作为实现农民富裕、国家富强和四个现代化的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有力抓手。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农业、忘记农民、淡漠农村；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从邓小平农村改革发展思想可以看出，农村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深刻的社会变革，动态变化的历史过程。农业基础巩固，农村和谐稳定，农民安居乐业，整个大局就有了保障，各项工作都会比较主动。实践证明：问题倒逼改革，解放思想促进改革；发展实践不会停止，农村改革需要全面深化、大胆作为。

站在新的历史方位，改革面临的问题和条件已经发生深刻变化，但农业大国的基本国情和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阶段性特征决定了农业还是“四化同步”的短腿，农村还是建设全面小康社会中的短板。面对剩下的难啃的“硬骨头”，需要持续用力推进农村综合改革，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系统总结农村改革发展中可资借鉴的经验，把握农村改革发展历程，理清新时代攻坚阶段“怎么改”的问题，乡村振兴需要在振兴什么、谁来振兴、怎么振兴上下足绣花功夫，以顺应人民要发展要美好生活的历史要求，使农村改革事业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

实施农村综合改革和乡村振兴战略要坚持方法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和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始终坚持和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聚焦农村改革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导向目标，哪里有问题，就在哪里改革，哪里的问题严重，就向哪里施以重拳；正确处理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胆子大与步子稳的辩证关系，提升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的协同效应，在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上，找准切入点，把握关联点，构筑主攻点，抢占制胜点，在农村综合改革和乡村振兴战略的伟大实践中实现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绝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改旗易帜的邪路。

坚持是最好的纪念。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是对小平同志农村改革思想的最好纪念。面向未来，我们要传承邓小平的精神和品格，更好地接过农村改革的“接力棒”，跑好乡村振兴的“接力赛”，以攻坚克难的决心、包容开放的信心、永不停息的恒心，继续解放思想，全面深化农村综合改革，巩固和扩大农村改革成果，让美丽乡村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底色，使中国的农村改革事业稳步向前，更加成熟定型。

（作者单位：邓小平研究中心、中共广安市委党史研究室）

践行党的民族政策 发展诠释长征精神

翁少琼



红军长征精神就是拥有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勇往直前、不屈不挠、前赴后继的奋斗精神。笔者以阿坝为点，试图论述在滚滚向前的历史长河中，党如何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的各历史时期，努力践行党的民族政策，致力于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幸福指数的不断提高，实现祥和安康的现代化小康生活，从而彰显着红军长征精神的丰富内涵，以发展诠释长征精神。

阿坝县位于青藏高原东南缘，四川省西北部，与甘肃、青海两省交界，系三省交界处的贸易集散地和藏传佛教的主要承传地之一。全县幅员面积10435平方公里。海拔3290米，辖17个乡、2镇、2场，总人口7万余人，是以藏民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聚居县。

解放前，阿坝草地系麦桑大土官经其三代人采

用械斗、暗杀、联姻、依靠国民党势力等方式不断扩张的区域，辖十八个部落。其最高统治者，集军政、经济等大权于一身，施行的政治制度是世袭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为了维护和巩固封建农奴制的统治，土官和寺院的宗教上层结为一体（大土官一般也是宗教领袖，具有还俗喇嘛的身份），制定了严苛的法规、设有监狱，对不服从统治的百姓施以罚款、服劳役等处罚，以及抄家、吊打、坐牢、割鼻、剁手、割耳、烙脸、挖眼、抽筋、投水等等残酷的刑罚，对民众实行“政教合一”的统治和剥削。

一、长征三过的草地革命火种在此播下

红军长征时期，1935年8月至9月和1936年7、8月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中，三次到过阿坝县境内，共历时数月。

1935年6月，两大红军主力在懋功会师。8月，沙窝会议后，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队，分为左右两路军分别北上。兼任左路军总指挥的朱德总司令、张国焘总政委和刘伯承参谋长率领的左路军，从卓克基出发，兵分两路进军阿坝。在途经龙日坝的托巴格勒时，击溃了马步芳所委任的国民党西北“剿匪”第一纵队司令麦桑土官杨俊扎西部的袭击，并设总部于查理寺内，同时，川康省委、省苏维埃也由卓克基移驻此地，还成立了阿坝特区委员会。中旬，在格尔登寺大殿内召开群众大会，成立了“川陕省阿坝苏维埃政府”，选出了娥姐、洛车儿等七名委员。九月初，以上机构又移驻格尔登寺。

1935年9月7日，张国焘过了一段草地后借口噶曲河上涨而率部返阿，并命令部分即将过完草地的红军部队返回南下。为实现他南下的意图，进行了一系列分裂党中央、分裂红军的活动。朱德、刘伯承、陈伯钧、胡底等红军指战员不畏张国焘的压制迫害，同张国焘的分裂言行展开了坚决的斗争。

红军长征在阿坝留住、活动期间，纪律严明。由于国民党实行坚壁清野，并规定凡给红军当通司、卖粮者均予处死、其家族牛羊、粮食等财产一律没收，妄图以此，困死饿死红军。在国民党及地方反动上层的欺骗恐吓下，许多村寨的群众逃跑一空，既见不到人也见不到粮食。筹粮是红军面临的头等大事。为筹集粮食，许多红军战士外出筹粮时被地方反动武装打死，缺粮已威胁到红军的生存。

阿坝的8、9月正值丰收的季节，阿曲河两岸的成熟青稞随风起伏。为筹集粮食红军只没收压榨群众、勾结国民党的反动土官老民的牛羊、粮食充作军粮。在收割地里因一时逃离而无人收割的青稞时，红军将收割土官、老民的庄稼一半留作军粮；收割群众的留三分之一，并留下等价的钱物或借条；夜晚宿营决也不进民房。红军以铁的纪律，模范执行少数民族政策，使留在村寨、寺庙的老弱病残及僧人们深受感动。逃离的群众开始回家并积极协助红军筹集粮草。

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会师，从甘孜行经色达后，又兵分两路再次进军阿坝。7月13日北上

红军的先头骑兵部队，（在今麦坤地带）猛击了企图阻止北上抗日红军的近五千反动地方武装，为北上扫除了障碍。经过中央批准，在这里成立了中央西北局，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随红二、四方面军北进。此间，先行部队按朱德总司令指示：在噶曲河边数公里处（今贾洛乡境内）设立“兵站”，为后续部队，减轻了困难。

红军长征三过阿坝，以草根、树皮、皮带充饥。不仅战胜了恶劣的自然条件和饥寒疾病；挫败了国民党及其地方武装的围追堵截；彻底粉碎了张国焘的阴谋分裂活动，而且还以在醒目的地方书写、篆刻汉、藏标语，贴布告、发传单，尽可能地召开群众会议等形式开展了宣传、发动群众等革命活动。红军走后，虽政权尚未得到巩固和发展，但红军的英雄形象和红军宣传的革命道理早已烙印在广大藏族同胞的心上，从而谱写了红军长征史上革命英雄主义的壮丽篇章。

长征时期因伤病所致的流落红军，更是与当地人民群众建立了血浓于水的情感。红军遗孤——碗子，在人民群众的庇护下，一家一捧糌粑将他抚育；被藏族老人收养的红军战士李兴文，在退休后临终前，用自己的积蓄做成转经桶，诵扬着这种世代深情；红军战士李国森将自己儿孙的名字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即：李志中、李志华、李志人、李志民……述说一个革命战士的夙愿。

在阿坝的剿匪肃特、民主改革等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现代化事业中，红军精神激励着各民族人民为建设和谐小康阿坝而团结奋斗，红军精神代代相传。

1950年，茂县地区（今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解放以后，开始在各地实行民族区域自治。7月，地委、行署派出工作组到阿坝草地，争取了以华尔功臣烈为首的少数民族实力派的支持，1951年8月，实现了阿坝草地的和平解放。9月，建立了“茂县专区四土、阿坝、绰斯甲临时军政委员会”阿坝办事处；12月阿坝第一届、第一次各族各界代表251名在中阿坝赛格寺召开大会，成立了阿坝藏族自治州（县）政府，推选华尔功臣烈（藏）为区

政府主席，宣告了阿坝草地的新生。1953年3月成立阿坝工委；1954年经西南行政委员会办公厅批准，阿坝设县并逐步完成建县工作。1958年夏开始，阿坝的民主改革全面展开，经艰苦细致的系列工作，1959年全面完成民主改革后，彻底废除了统治阿坝人民长达近千年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废除了草山土地土官所有制、实行人民所有制；取消一切封建特权，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了反动武装，维护了社会稳定。使各族群众获得了真正的翻身解放，人民当家作主，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完成了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飞跃，开创了阿坝县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新纪元。

二、党的民族政策的践行

红军长征时期，特别在践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保护宗教场所、尊重少数民族习俗、禁忌方面，均有硬性规定：如发布“未经上级批准，不准打喇嘛寺庙；不准砍神山和寺庙周围的树，不准钓寺院周围的鱼，不准动麻尼杆经幡；不准动寺院与经堂”；“禁止在回民同意的宿营地内食用猪肉、油，不得借用回民的生活用具；不得进入清真寺，不准破坏回教经典”等内容的《工农红军布告》。宣传并主张民族自决、民族平等、团结，反对民族歧视，废除一切过去官方文告中对少数民族的侮辱性、歧视性称谓，尊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将各民族平等、团结作为这一时期的民族工作重点。在以严明纪律为保障下执行。一红军战士因饥饿难忍，进寺庙拿了些糌粑和三个银元，被执行纪律枪毙了。红军部队严明纪律，切实维护群众利益的言行、团结抗日的政治主张、党的民族政策的宣传和大无畏的英勇革命形象，深深地烙印于人民心中，并为以后民主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推进打下了一定基础。

和平解放阿坝后，临时军委会阿坝办事处和阿坝藏族自治州政府成立。这是阿坝草地建立的第一个民族民主政权，是党的区域自治政策的有效践

行，是党在草地工作取得的重大进展，也是践行党的统战政策的成功典范。团结、教育、争取、改造大多数，孤立和打击极少数的方针，与民族上中层，建立起清匪肃特、反对封建农奴制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一方面安排他们担任各级政府的职务，在工作中学习提高；一方面组织他们到内地参观学习，使民族上中层人士直接感受了内地欣欣向荣的景象和人民群众对新社会、对党和人民政府的拥护；在各地受到的热情欢迎和接待，也使他们对党的民族平等、团结的政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信任；进而使他们接受教育，提高觉悟。工委所下派上中下阿坝、壤塘、果洛、白玉、麦洼、安曲、柯河、麦尔玛等地的工作队（组）深入村寨，接触、了解群众的疾苦，掌握社情、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同时向困难群众发放救济款和救济物资，大力开展群众工作，恢复生产、改善民生。

发展经济。建立金融业，改变了以物易物的传统经营格局，有力打击了欺行霸市、银元黑市，规范经济次序；设立民族贸易分公司并相继在各地建立了8个固定的或流动的贸易小组（站），确保茶叶、食盐、粮食、日用品、农用物资的供给，收购百姓的畜产品、中药材，使商贸更加活跃。

随着建政工作的日趋完善，市政建设逐步加强。在广袤的草地上，经艰苦奋发努力于民改前基本建成了阿坝城市的雏形。依托农畜产品粗加工的起步、褐煤的开采，以及民主人士和进步上层鼎力协助政府，建起第一座水能发电站，不仅改变了松烛、酥油灯照明的历史，而且推动了工业发展的起步，也展示了党的民族政策有效践行。

修建公路。解放前，阿坝没有一寸公路。1953年，人民解放军进入草地剿匪期间，修筑了从若尔盖起，经二道卡、贾曲桥、贾洛至麦尔玛，全长119公里的简易公路，从而改写了阿坝没有公路的历史。1955年11月1日，全长505公里的成阿公路（成都至阿坝）正式通车，不仅改变了人背畜驮行羊肠小道的历史，而且打开了阿坝长期的封闭状态，实现了与内地和自治州各地的政治、经济联系，为阿坝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

开展卫生教育工作，推动社会的进步。1951年6月，中央卫生工作队（西南分队）到阿，在塔洼甲康坝租下几间矮小的土屋开始工作，并深入麦洼、若尔盖、柯河、果洛、上中下阿坝等地的寨子、帐篷，为广大农牧民群众免费诊疗治病。他们态度和蔼、工作认真，即使是麻风病和性病梅毒的患者也不嫌弃避讳。老百姓遇有急病或新生儿出生，无论深更半夜还是刮风下雨下雪，都是随叫随到。使各族群众直接体会到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同时，卫生工作队还广泛地进行一般的卫生和妇幼知识的普及与宣传，白天治病晚上宣传。党和政府非常重视民族卫生人员的培养和卫生事业的建立，举办了卫生员、接生员和民族干部3个培训班，在他们的帮助下，阿坝卫生医疗事业随之建立起来。以此，践行党的民族平等互助政策，得以具体体现。

创办民族教育。解放前，阿坝草地没有一所现代的学校，广大百姓根本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绝大多数普通百姓是文盲。只有土官、管家、头人、寨主、带兵官等贵族子弟，才能在寺院的“扎仓”（寺院的教育部门）接受文化教育，学习藏文经典和宗教教规等。1952年2月，阿坝县第一所民族小学（城关一小的前身）租用民房成立，首批招收学生共79名，设2个教学班，有教师2名。格尔登寺喇嘛杨番（藏族）任小学校长，自治区政府委员马友德（回族）任副校长，尽管条件极为简陋、教师和学生人数很少，但它的诞生成为阿坝现代民族教育事业起步的标志，广大劳动人民及其子女才开始有了充分平等享受文化教育的权利。科技知识的初步宣传与实践。在开展畜群疫病防治的同时，试种莲花白、土豆、白萝卜等蔬菜成功，并得以逐步推广。改变了靠天牧畜，无力抵御疫病和无蔬菜食用的历史。这是践行党的民族政策，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有效体现的一个方面。

把加快培养民族干部作为组织建设、干部队伍建设的工作重点。一是选拔年轻进步的翻身农奴、靠近党和政府的年轻僧尼，送到刷经寺自治区民族干部学校，学习基础文化知识和党的民族政策，毕

业后再送至雅安商校、卫生学校或西南民族学院等进行培训，使一批具备专业知识的民族干部成长起来。二是举办会计、兽防、医护基础知识的短期培训班，对藏族青年积极分子、有一定文化的进步年轻僧人进行培训，补充为基层干部。三是吸收在平叛、民改斗争中优秀的民兵、退转军人为干部，充实到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中。通过这些工作，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干部迅速成长。如：骁勇的阿坝县大队，在平叛斗争中，不仅为保卫新生政权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在基层组织和各岗位，成为党的民族政策的忠实践行者。这是党的群众路线无限生命力的展示，也是党的区域自治政策，在组织队伍建设方面的有效践行。至此，践行党的民族政策，具体贯彻落实于每项工作的全过程。

在民主革命阶段，党团结和带领各族人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少数民族上层及少数民族宗教上层，建立了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推翻了三座大山，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进而顺利完成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有力地推进了社会主义建设。为以后的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构建和谐小康社会的向前发展夯实了基础。

新时期，党委、政府更加深入地践行党的各项民族政策，特别是民族宗教、民族文化遗产和民族干部人才的培养方面更为凸显。

藏传佛教得到充分保护和发展。阿坝县是藏传佛教的主要承传地之一，农牧民群众90%以上系信教群众。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以划拨、补助等多种投入方式，修缮、恢复完善了藏传佛教的相关设施（路、水、电、广播电视、通信）；全覆盖养老、医疗保险和寺庙管理机构成员补助；支持正常的宗教活动。充分满足了信教群众信教自由的需求。现有寺观、寺庙几十处（含一座清真寺），藏传佛教集格鲁、萨迦、本波、觉囊、宁玛五大教派于一体，堪称宗教文化大观园。寺内有各式菩萨、观音塑像、唐卡画、酥油花，古经文等代表藏民族传统文化的希世文物，具有极高的观赏、研究价值，在藏区居榜首之例。这是践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最

有力的体现。

近年，国家大力投入文化事业，以举办民歌大赛、藏戏表演、民间故事弹唱、挖掘整理格萨尔王传等方式，使民间文化艺术得以传承和发展。

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及各种人才。通过各种渠道，以送培、短训、交流等多种形式，对少数民族干部进行培养。使他们在思想意识上牢固树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民族观，能了解、掌握和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从而更加丰富他们的民族政策理论知识，提高他们的政策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大力培养少数民族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使他们掌握管理知识、提高其经济社会各领域的管理能力；使他们掌握各种技术知识，熟练掌握各种技能，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建设。到目前，少数民族干部占全县各类干部和干部总数的80%，从而为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全面贯彻落实，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保障。

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实施，在政治上实现了保障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权利，经济上做到了可根据地区的实际需要自主地制定发展规划，并通过民族间的互助作用，使民族间的发展趋向平衡。特别是对口支援所实施的援藏项目，贯穿于教育、卫生、基础设施、农牧业、市政规划与建设等各领域、各行业，充分体现了各民族平等团结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三、发展诠释红军长征精神的丰富内涵

践行党的民族政策进程，也是党团结带领各民族人民，以红军长征精神，致力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特别是构建和谐小康社会向前发展的进程。红色阿坝的巨变诠释了红军长征精神的丰富内涵。

新时期，基础设施建设突飞猛进。县城经过多期市政新建、改建完成了街道路面整治和排水沟、污水主管、供暖网管的铺设等。一座座具有浓郁安多藏民族风貌的崭新高楼拔地而起，特别是南岸新区的开发建设，配以悉心的绿化、美化、亮化，街

道整洁舒适，路灯耀眼。相继竣工使用的自来水厂、垃圾处理厂、休闲广场和集体体育运动、文化交流、文化展览等为一体的体育广场，满足了人们的生活需求，提高了生活质量。美丽的高原商城点缀着川西北草原，彰显着三省结合部的枢纽辐射魅力。

交通、通讯发展迅速。如今通县油路已替代四级沙石路，宽敞的钢混桥已替独木桥，居民区小巷、藏寨内的水泥路已替代泥泞小路，城乡交通网络已基本建成。出租车、公交车使人们的生活更加便捷；摩托车牧畜成了牧民的生产手段。随着通讯网覆盖的不断扩大，电信、移动、联通的加速发展，人们的现代通讯，缩小了与世界的差距。

水利、电力不断发展。水利以服务“三农”为核心，切实抓好人畜饮水工程建设，有效解决了农牧区人畜的安全饮水。强化水土保持，狠抓小河流域治理。电力：在进行了农网、城网的相继改造建设；微水电站、“光伏电站”的建成及110KV输变电的运行，基本满足了城乡生产、生活用电，风能、光能将得以进一步开发。

工业发展基础得以夯实。引进发展新技术，依托农畜产品的深精规模加工，夯实工业发展基础。

农牧业发展稳步推进。逐步健全了各项机制，以科学发展和法律、法规，切实保障、维护了农牧民群众的权益，实现了确保各族人民共谋发展，共享改革成果。在国家的大力投入中，有计划地调整种养结构、推行动物防疫体系建设、农牧业基础设施建设、人草畜三配套建设、天然草地恢复与建设、鼠虫害防治、牧民新村建设、种养科技改良、各专业基地建设，公司化的规模生产营运，向现代化农牧业发展迈出了坚定步伐。

生态文明建设得以推进。以“保生态促发展”、“建设绿色高地”的方针，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强化自然保护区管理和沙化治理，不断完善生态管护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工作力度不断加强。

民族贸易长足发展。阿坝县是川甘青三省结合部，具有悠久历史的物资贸易集散地。个体商业得以迅猛发展，先后建起了综合农贸、农畜土特产品

批发、德惠等多家超市；小五金加工、建材、汽修等专营市场，贸易环境逐步完善。

旅游开发逐步推进。美丽的大草原、秀美的大森林峡谷、神奇壮美的莲宝叶则神山、建筑风格独特的民居和多姿多彩的民风民俗，革命英雄主义的红军长征遗迹构成了阿坝县丰富的旅游资源。为旅游业的开发发展，创造了必然条件。

社会事业全面发展。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进程中，文化事业发挥了积极作用并得到了丰富和发展。送电影下乡；组建业余演出队深入农牧区表演歌舞；建立乡村文化站；大力开展创作文艺歌舞作品；积极组织参加各级体育比赛；执法监管文化市场；传承民间文化艺术；使文化、体育服务体系职能得以充分发挥。广播电视的数字化发展，发挥了宣传的阵地作用，各族人民的文化体育生活得到不断地丰富和发展。

社会保障、救助体系逐步完善。以维护群众利益，保障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居有住所，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在医保的基础上，实施了“应保尽保”的农村、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建立了农村新型合作医疗，提高保障基数，进一步健全了农牧民的医疗卫生保障体系。

科技不断进步。农牧业发展、科技先行，开展科普宣传、送科技下乡；引进推广种养优良品种，特别是中药材、蔬菜的规模化生产营运的起步，推进了现代化农牧业发展进程。

教育不断发展。国家实施“十年教育行动计划”、“两免一补”政策，大骨节病综合治理的“易地育人”措施，国家大力投入和对口支援，改扩建了各学校教学楼、学生宿舍及其配套的浴室、餐厅、礼堂、室内外体育设施等，各学校都配有图书阅览室，有多所学校建立了多功能网络教室，特别是“双语”中学的竣工使用，使教学软硬件设施逐步完备。坚持“教育与宗教相分离”的原则，处理好两者关系，强化“双语”特色教学和寄宿制学校的管理，不断巩固扫盲、“两基”义务教育成果，提高了教育教学质量。

卫生事业蓬勃发展。国家大力投入。阿坝县藏

医院自成立以来，经不断的升级改造，发展成为省内首家，使用藏医药治疗风湿性关节炎等杂症的医院，藏医药由此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展。县人民医院得以新建搬迁；建立了妇幼保健院、疾病控制中心、卫生执法监督所；培训医务人员；防治大骨节病；强化卫生知识宣传，推行新接生法，加强疫病普查和防治，人们得到了较为完备的医疗体系服务；同时，少数民族人口在优生优育、扶持奖励等政策支持下，得到健康发展。

党立足于民族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立足于少数民族文化的弘扬，立足于少数民族根本利益的保障和实现，探索出了切实可行的对策和措施：民族贸易优惠待遇、税收减免、专项资助、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不断加强、加大对民族地区的投入、实施西部大开发等等，党的民族政策在具体实施不断取得成就的过程中迸发出其无穷的蕴涵力。

全县随着交通、通讯网络的逐步建成；实施大骨节病综合治理，移民搬迁；牧民新村、美丽幸福村寨建设；城乡公益设施等基础条件的日趋完善；卫生医疗体系的不断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从根本上实现了农牧区交通、通讯通畅便捷，农牧民看病方便、喝上了干净卫生的自来水，农牧民子女上学由国家全包干，实施全免费“9+3”中职教育、“6+3”教育工程、双语教学，藏文软件的开发与应用；民间文化艺术、藏医药等得以不断挖掘、传承和发扬；文化、教育事业蓬勃发展。整体面貌发生了巨变，为全面推进小康和谐社会建设夯实了基础。

阿坝县近七十年发展历程，巨变诠释着红军长征精神。各民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认真践行党的民族政策，正确处理和解决民族问题，建立和完善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蓬勃发展，以彰显红军长征精神的开创、坚定不移、大无畏、勇往直前、实事求是、群众利益高于一切……的丰富内涵，从胜利走向胜利，高扬五星红旗，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

（作者单位：阿坝县委党史研究室）

向阳乡全国首摘人民公社牌子

谢海彬

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南斯拉夫的朋友时谈到：“中国的改革和开放首先是从农村改革开始的，有两个省带头，一个是安徽省，一个是四川省，那是我的家乡……”四川省带头实施改革的就是广汉，而向阳又因在全国第一个取消人民公社恢复乡级人民政府建制，被誉为“中国第一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广汉县向阳公社普通老百姓“一穷二白三苦”，住的是泥草的房子、干的是牛马的工作，当地民间顺口溜有“有女莫嫁向阳郎，吃的稀饭浪打浪；住的草房笆笆墙，走的泥路弯又长”，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群众举步维艰的经济生活状况。

向阳地处成都平原，都江堰自流灌区，水旱从人、安定富庶，自然条件良好、区位优势优越，怎么会产生这种落后的局面呢？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当时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组织形式也是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县以下的基层行政组织是区人民政府和乡镇人民政府两级政权，或者是区公所和乡镇一级政府并存。直到1954年9月，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和《地方组织法》的颁布，为乡镇基层政权组织建设提供了法律依据，确立了乡镇人民政府是县以下唯一的一级政权组织。1956年9月，党



的八大决定，乡镇按规定成立基层党组织，领导基层政权的工作。到1958年，县以下基层政权进入人民公社化时期，人民公社取代乡镇人民政府和农业合作组织，实行政社合一，行使国家基层行政管理和社会生产管理双重职能。这种体制的重大弊端在于——“党政企”三者合一，实行“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三级管理体制，用行政命令搞

生产，用军事化的方式分配资源，农民集体劳动、集体分配、吃大锅饭。这当然没有办法有力激发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直接制约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随着农村改革和经济的发展，人民公社与现行体制不相适应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促使人民公社体制发生变革。

1979年初，广汉县委在全县推广了金鱼公社包产到组的经验，农民在生产上有了自主权，分配上克服了平均主义，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但同时，县委又发现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体制与实行包产到组责任制后的情况不相适应。县委经过充分调查研究，开始着手对公社体制进行改革。7月，在四川省委支持下，县委派工作组到向阳公社试点，探索农村经济体制改革。8月，县委在向阳公社的社队企业中推广新丰公社一砖厂“定、包、奖”（人人定岗位、包任务、超奖短赔）岗位责任制试验的经验，对社队企业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改革：改社办工业为社队集资联办；改任命干部为选举、聘请干部；改“吃大锅饭”为“定、包、奖”岗位责任制。把干部、务工社员的经济利益同企业生产经营好坏直接挂钩，严格考核，奖惩兑现，有效地解决了社队企业经营上长期存在的领导工作乱、财务开支乱、人员安排乱的“三乱”现象。接着撤销了公社原有的“企业办公室”，成立了公社工业公司。全公社66个生产队成了工业公司的“股东”，在人、财、物方面都有了一定的权力，社员群众对企业的发展也关心了，促进了社队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工业公司1979年完成产值227万元、利润38万元。^①

1979年9月，广汉县委决定在向阳公社进行政社工作分开试点，把16个干部分成三个班子：一是行政班子6人，负责抓全社的青年、妇女、民兵、治保、民政、调解、文教、卫生、接待等工作，以及处理日常行政事务；二是农副业班子6人，负责抓全社的农副业生产；三是社队企业班子

4人，负责抓全社的社队企业工作。政社分工后，对农副业、社队企业两个班子的人员，实行“三定”岗位责任制，年终根据完成任务情况，与工资挂钩，进行奖惩，以调动工作积极性，鼓励他们更加努力为农副业大发展贡献力量。这样，在“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内形成了党、政、企分开办公的格局。公社党委摆脱了事务工作，克服了“事事找书记，书记忙不开”的现象。干部作风也有了明显的转变，克服了“开会当客人，下队当游人”的现象，不但促进了生产，还减少了开支。

1980年3月30日，四川省委召集广汉县委正副书记等人到成都金牛坝招待所汇报情况，向阳公社改革管理体制的试点情况得到相关领导的支持后，广汉县委迅速召开县委常委会议，决定选择向阳公社作为“撤社建乡”工作的试点。4月，向阳公社召开党委和管委会干部会议，研究了撤销人民公社建立乡政府的具体实施办法，并明确规定：进行这项改革，只能埋头做扎实细致的工作，不对外宣传，不上报，不举行任何仪式。紧接着公社党委召开了全公社党员干部大会，向大家阐述了撤销公社、恢复建立乡政府的意义和具体安排意见，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拥护。向阳内部宣布取消人民公社名称，成立乡党委、乡人民政府和农工商联合公司，从组织机构上把党、政、企分开。大队更名为村，生产队更名为农业生产合作社，同时向上级报告。四川省委经过慎重研究，同意广汉向阳先试验，对外不宣传。

1980年6月18日，向阳公社在全国率先摘下挂了20年的“广汉县向阳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牌子，正式挂出“广汉县向阳乡人民政府”的牌子。^②公社更名为乡，建立乡党委。乡党委成员暂由原公社党委成员组成，下届党委成员由乡党员全体代表大会选举。公社“管委会”更名为乡政府，成为农村基层政权组织，负责贯彻执行上级政府的政策、法令，确保完成上级政府下达的各项任务。乡长、副乡长由乡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大队更名为村，设村长和文书各一人，承担乡政府下属的行政事务工作。行政村建立党支部。生产队更名为



今日广汉。

农业生产合作社。合作社的正副社长、会计等管理干部，由社员大会选举产生。

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变革，理顺了农村党、政、经三者之间的关系。新体制的建立，不仅加强和改善了党的领导，增强了农村党组织的战斗力和战斗力。通过改革，从组织上保证了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稳定和完善，推动了农村合作经济向着多种形式、多层次、多种经济成分联合与专业化、社会化方向发展。

1980年12月5日，新华社以“内部参考”的形式登载了《广汉县向阳公社改革“政社合一”领导体制，实行乡村合作社体制已显示出优越性》的文章。12月24日，四川省委联合调查队又就广汉向阳政治体制改革一事，形成了明确肯定的调查报告：“改革的方向是对的，步子是稳的，也是比较成功的，而且已能看到改革后的成效”。1982年12月，第五届全国人大新修改的《宪法》规定：“乡、民族乡、镇是我国最基层的行政区域，乡镇行政区域内的行政工作由乡镇人民政府负责，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至此，广汉向阳撤社建乡试点的成果得到中央肯定，并在宪法中巩固下来。

向阳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摘牌与向阳乡人民政府挂牌，这看似简单的换牌之举，实际上却蕴含着

实践的智慧与改革的胆略，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它助推了中国农村改革的浪潮，在一定意义上改变了数以亿计中国农民的命运，真可谓是一举惊天、深得民心，被农村改革学者誉为“北有凤阳、南有向阳”。

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向阳在率先实行基层政权改革后，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和发展，《改革时报》《四川日报》《四川农村日报》等媒体对向阳的农村改革先后作了重点报道。1998年11月16日，《四川农村日报》为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20周年，在第5444期头版头条以《春雷第一声，向阳，中国第一乡》为题再次回顾报道了向阳首摘人民公社牌子的壮举，以铭记这载入中国农村改革历史的重要事件。

在党的正确指导、亲切关怀和鞭策鼓励下，向阳沐浴着新时代的东风，继续发扬“敢为天下先”的奋斗拼搏精神，在工业经济、农业经济、城镇建设及社会事业等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呈现出一派盎然生机、“欣欣向阳”的景象。向阳农村改革与发展历程是我国乡镇改革发展史上的一个缩影和典范，为中国乡镇改革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历史记忆。

（作者单位：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

参考文献

- ①《省委联合调查组广汉县向阳公社农村体制改革的情况》，《广汉农村改革专题资料编（1978—2007）》第133页，中共广汉市委党史研究室2008年10月内部编印。
- ②关于向阳公社摘牌时间，说法不一。本文采用6月18日，是

根据《谭启龙回忆录》和《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大事记（1979—1998）》记载。另据广汉市委党史研究室考证，摘牌时间为1980年9月。

坚持“党史姓党” 为党修史立传

——论新时代“党史人”的使命与担当

万晓翠 段雯



一、坚持“党史姓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我们党的历史，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党史工作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建设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①。做好党史工作，就是用党的伟大成就激励人，用党的优良传统教育人，用党的成功经验启迪人，用党的历史教训警示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史研究是一项政治性很强的工作，要坚持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坚持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宣传纪律和充分发挥个人创造性的统一。正因为如此，党史工作要坚持“三个必须”，一是党史工作的性质必须与党的性质保持一致；二是党史工作方向必须与党的工作方向保持一致；三是党史工作的价值取向必须与党的性质的价值取向保持一致。

（一）党史工作的性质必须与党的性质保持一

致，即党史工作必须坚持党性原则和对党绝对忠诚的原则。坚持党性原则，就是要在存史载史、宣传教育人、资政研究、队伍建设等各项工作中，始终遵循“体现党的意志，反映党的主张，维护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坚持党史工作的正确方向”^②。党史工作的正确方向，就是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实事求是地研究和宣传党的历史。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党史工作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就要牢牢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揭示和宣传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和核心作用形成的历史必然性；揭示和宣传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揭示和宣传通过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性；揭示和宣传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领导人民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和辉煌成就；揭示和宣传党在长期奋斗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形成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③。

坚持对党绝对忠诚原则，即“在思想上政治上

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在各项工作中毫不动摇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打任何折扣。“天下至德，莫过于忠。”绝对忠诚于党，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党史工作是党的工作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党忠诚就是要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牢固树立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优势、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观点。党史工作者对党的忠诚就是要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加强和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二）党史工作方向必须与党的工作方向保持一致，即党史工作要始终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原则。我们党98年的光辉历史是一部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革命史、实践史、创新史、为民史，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富民强国的历程，极具说服力地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和正确，党的历史可歌可泣应当彪炳于千秋，这为我们党史研究提供了最高指导。党史研究工作是党的建设的基础工作，在新时代党的建设和国家发展的新任务、新要求下，党史工作部门应当牢记责任、勇于担当，立足党的光荣历史，着眼当前党的任务，把握党未来前进的方向，把党史工作主动担负起来，立足到大局中心当中去，主动作为，发挥作用。

党史工作关注和研究的对象是昨天；党史工作又是为现实和未来提供历史智慧的工作，它需要站在时代的高度、用具有前瞻性的思维去回望历史。新时代对党史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党史工作，必须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把以史鉴今、资政育人作为根本任务，坚持党性原则和科学精神统一，主要做好深化党史资政研究、扩大党史宣传教育人、搞好党史资料征编、组织党史学习教育、加强党史遗址保护六个方面的具体工作。对于党史工作者来说，应当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忠于职守、勇于担当，精益求精、追求卓越，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党史工作也需要我们在新时代付出艰苦努力才能取得高质量大效益。

（三）党史工作的价值取向必须与党的性质的价值取向保持一致，即坚持“以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宣传党的历史”原则和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我们回顾历史，不是为了从成功中寻求慰藉，更不是为了躺在功劳簿上、为回避今天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寻找借口，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党史不仅记录着党的奋斗历史，也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精神追求。党史工作是为党修史立传、为党撰写“红色家谱”。做好党史工作对于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深化对历史规律的认识，帮助广大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提高素质和能力，做好各项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广泛宣传党的光辉历程，对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坚信马克思主义生命力，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教育广大群众坚定跟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的决心和信心，具有重要意义；对于进一步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及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要意义；对于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进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党的十九大确定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

反对历史虚无主义首先要看到历史虚无主义的危害性。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主张历史应当“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而历史虚无主义，对待历史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和“在他们

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把历史视为一种无主体的偶然结果，否定历史唯物主义，否定历史的规律性。^④历史虚无主义带有强烈的唯心主义色彩，承认历史进程中的个别现象而否定其本质，孤立地分析历史进程中的阶段性而否定其发展的整体性，片面地关注历史进程中的支流而否定其主流，以“假设”否定历史史实以达到“重构历史”的目的。习近平同志指出：“以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待党的历史，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执政使命的必然要求，是应对意识形态领域挑战，抵制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图谋的必然要求，是开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局面的必然要求，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关系我国社会主义前途命运。”要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就要建立健全党史领域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和风险防控体系，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党史部门要加强对当地重要纪念活动、出版物、影视作品、红色遗址保护利用、纪念馆展陈和红色旅游项目中涉及党史部分的审读审查职能，把好政治和史实关口。要加强涉党史舆情分析研判和辨析引导，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旗帜鲜明批驳歪曲党的历史、丑化党的领袖、抹黑英雄模范人物的错误言论和错误倾向，扎实开展“清理网上歪曲党史国史内容”专项行动，坚决维护党的历史和党的形象。

二、为党修史立传，推动新时代党史工作

（一）“党史人”的初心与使命。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是“党史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党史人”的政治灵魂，是“党史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革命理想高于天，要把理想信念教育作为思想建设的战略任务，教育引导广大党员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头脑，立根固本、补钙壮骨，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之力开创美好未来。作为一名“党史人”应当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念，应当将自己的全部精力立足

于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伟大事业。作为一名“党史人”要时时打牢信仰之基，要为党修史立传、谱写“红色家书”、传承红色基因，既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者，又要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始终心中装着党，想着人民，爱着国家，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推动地方党史工作不断向前发展。

（二）新时代如何进一步推进党史工作。

1、党史工作者要不断增强“四个意识”。一是不断增强“政治意识”。党史工作是党的一项具有全局意义和深远影响的工作。党史姓党，是党史工作的生命线，是党史工作保持正确发展的根本。党史工作的特性，要求党史工作者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坚持政治原则，强化党性观念。二是不断增强“大局意识”。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党史工作实现自身价值的重要途径。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是党史工作生命力所在。党史工作者要更好地完成本职工作，需要不断拓展视野，把自己的工作放到全局中去定位，认清自己的工作与全局工作的关系，在全局与本职的双向互动中做好本职工作。要围绕中心任务谋划党史工作，要发挥自身优势服务中心工作，要着力为中心工作营造良好环境氛围。三是不断增强“核心意识”。党史工作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一种政治纪律。从我们党的历史来看，只有切实增强核心意识，共同维护党的集中统一，我们才能不惧各种风险考验，以共同意志凝聚强大力量，开辟事业发展更加光明的前景。党史工作者要载录好、总结好、提炼好党的历史，必须维护坚定地党的权威和党的领袖的权威。四是不断增强“看齐意识”。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讲政治是突出的特点和优势，而讲政治的首要就是向党中央看齐，这是贯穿党性要求的原则性命题。每个党员都要牢固树立看齐意识，使之扎根于思想、融入于工作、体现于行动。党史工作是为党修史立传、谱写“红色家书”、传承红色基因，更需要每一名党史工作者树

立大局观念和全局意识，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党的事业不断走向胜利。

2、开拓视野，认清和把握党和国家工作的大局。一是要做好应对复杂国际局势的准备。我们要善于分析和把握国家局势，认清机遇和挑战，根据局势、环境的要求把党史工作做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通过对中国与世界的矛盾、中国内部的各种矛盾进行科学分析，提出党、国家和人民面临的历史任务。新时代，世界形势更加复杂多变，怎样把握世界发展的趋势，怎样使中国始终走在时代潮流的前列，需要党史工作者了解和把握国情和世情。二是了解党的建设的总体布局。改革开放以来，伟大工程不断由伟大事业赋予新的科学内涵，从而不断开创新局面。比如，党的十二大在确定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宏伟纲领的同时，提出努力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的任务。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把党的建设提到“新的伟大的工程”的高度。党的十六大要求党的建设必须按照党的政治路线来进行、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来展开。党的十八大强调要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党的十九大对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作出全面部署，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强调，“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新时代，把我们党建设好、建设强，确保党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必须深入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布局。作为党史工作者对党的建设的总体布局以及

新的特点，应该有所了解。

3、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做好新时代党史工作。中国几千年来历朝历代的当政者都对历史编纂工作非常重视。历史学家形成了崇高的历史责任感，既希望给后人留下一部信史，又希望给当政者提供资政的帮助。梁启超概括“史家四长”，即德、才、学、识。德是德行，才是能力，学是知识，识是见解。中共党史是我们党自己的历史，是从过去延伸到现在，还要进一步走向未来的历史。党史工作肩负着总结党的历史和执政经验、研究党的执政规律的神圣使命，肩负着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为实现“两个一百年”贡献力量等重要责任，这是党和时代赋予党史部门的光荣任务。作为党史工作者要树立“在其位谋其政”“有为有位”的意识，要把党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准确、全面地记载下来，让它成为中华民族整个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只有记好了、写好了，我们才对得起前人、对得起先烈、对得起历史，也对得起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自己。进入21世纪，随着“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期的到来，我们党的历史正在继续向前延伸，面向未来，我们需要通过总结历史经验，为实现新的历史任务提供借鉴。党史工作者更应当树立克己奉公、甘于奉献的责任意识，自觉抵制金钱、名利、地位的诱惑，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主动作为、积极进取，通过构建“大党史”工作格局，推动党史事业更快发展、更好发展、更加繁荣，把党史“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功能性发挥到极致。

（作者单位：中共绵阳市委党史研究室）

参考文献

①《让“党史工作是全党的工作”深入人心》。李家武。求是网，2018年02月02日登载

②《党史为什么姓党——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姓党”的重要论述》。单辉。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5年9月7日登载

③习近平总书记在2010年7月21日召开的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④《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瞿兆松。求是网。2018年2月13日登载



在屏山传播马克思主义第一人——徐经邦

徐经邦，字文钦，宜宾市屏山县富荣镇人。徐经邦5岁启蒙读私塾，熟读唐诗、经史。1917年，进入屏山县立高等小学校第七班学习，1919年毕业，次年因成绩优异，被县府公费选送到川南师范学校，经考试合格，编入该校十三班学习。其时中共党员恽代英应聘到该校先后任教务主任和校长，并亲自教课，秘密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读书会，组织进步学生参加学习。在恽代英的教育和影响下，徐经邦认真学习《共产党宣言》《人生哲学与唯物史观》等进步书刊，刻苦钻研科学文化知识，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思想觉悟不断提高，并加入了恽代英组织的进步青年组织“学行励进会”。

1922年，中国社会青年团组织在川南师范学校建立时，徐经邦被第一批吸收入团，从此走上革命道路。是年春节前后，积极参加恽代英率领的川南师范旅行讲演团，步行内江、自贡、宜宾、合江等地，行程2000余里，沿途宣传反帝反封建和爱国主义思想，传播新文化知识。1924年，从川南师范毕业后，仍与恽代英保持组织联系。1925年冬，经恽代英介绍，结识中共重庆地委负责人杨闇公，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5年至1926年，先后在国民党部队王伯常、白晏清旅任职，从事党的工作。

1926年底，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徐经邦返屏筹组国民党屏山县党部，任筹备主任。在县城武宫衙门挂上了“国民党屏山县临时县党部”的牌子。此后，便利用筹备主任的身份，在群众中公开活动。为了培养干部、壮大革命力量，在县城创办了中山小学，招生百余人，聘请徐岱宗、曾仲德等进步教

师任教，招生100余人。有步骤有计划地传播马列主义革命思想，目的是在传播这种思想意识的进程中潜移默化形成共同的理想，走共同的革命之路，培养和发展共产党党员，壮大党的力量。

为尽快唤醒更多的民众觉悟，徐经邦利用春节农民走亲访友的传统习惯，深入农村，了解农民的疾苦和要求，用摆龙门阵的方式，向农民讲《湖南农协会章程》，讲农民运动的历史人物李自成、张献忠、四川青年农民暴动领头人王小波的故事，启发农民觉悟。徐经邦抓住农民反对苛捐重税这一主要矛盾，把农民发动起来，1927年2月下旬，成立屏山县农民协会，徐经邦担任县农协会主席。在宣传发动组织农民运动中，培养了一批矢志革命的青年，有计划、有步骤地向他们传播马克思主义，培养他们共产主义的信仰。深入农村广泛发动农民，宣传革命思想，讲解湖南农协会简章，提出了“参加农协会不交烟税”的口号。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和支持，一时会员达六七千人。3月31日，领导农协会会员五六千人，掀起大规模的抗捐运动，并围攻了县城。国民党反动派对此十分恐慌，国民党屏山县县长肖席珍急电反动军阀覃筱楼派兵镇压，4月11日清晨，徐经邦不幸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5月7日，覃筱楼以“聚众轰城，图谋不轨”的罪名，将徐经邦枪杀于屏山县西部泥溪湾。1951年7月11日，乐山专员公署将其追认为革命烈士。

徐经邦在屏山有组织地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为屏山革命的开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宜宾市屏山县委党史研究室 供稿）

寻找陈桂兰：江湖庙堂，生死两茫茫

蔡勇



孤苦伶仃，张琴秋特招当红军

陈桂兰，又名陈洁茹，四川省广元市旺苍县东河镇人，生于1919年农历冬月29日，原籍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老地名九字坡。12岁时，父亲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后来在逃跑时被开枪打死。母亲因累成疾而且过度悲伤也在第二年过世了。陈桂兰没有兄弟姐妹，也没有一个亲人，是一个地道的孤儿，那一年她才十四岁。

常言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早在两年前陈桂兰就承担起了家庭生活的重任，砍柴，种地，侍奉母亲，购买油米，挑水做饭等家庭琐事就都靠她，她也确实无一不会。在这大山深处，人烟稀少，单家

独户显得格外孤单。她的家只是一处破旧的草屋，里面除了灶台上有一口陈旧的锅，几只带缺的碗，床上有条破被以外，一无所有。

1932年，红军来到通江，打土豪分田地搞得轰轰烈烈。看到红军的队伍里面也有与她年龄差不多大的女兵，顿时就有了要当红军的念头，好歹也能有一碗饭吃。由于年龄太小，几次报名当兵部队都不要。1933年2月，张琴秋路过参军报名处，知道她是孤儿后，才把她招进来，安排在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某营三连新兵班。她们从通江一直跟随部队到了旺苍坝。当时，班长是王乙香，后改名王定国。

1935年初，为迎接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会合，部队又决定扩大宣传队伍，爱唱爱跳的陈桂兰被正式调到隶属于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的前进剧社；当时担任前进剧社和妇女独立团的通信员就是武杰。陈桂兰所在的这个班，在成立妇女独立师之后就编入了总部的前进剧社。原妇女团的团长政委以及连长指导员都担任了剧社的领导。剧社只有三十多人，她们曾在行军打仗的过程中工作很是出色。编导小节目，如快板儿、诗歌、小话剧等紧扣部队的战斗生活。部队在行军过程中她们就站在部队经过的路边打着竹板儿，为战士们鼓劲加油。部队在休息时，她们就下到最基层的连队为战士们演小节目，有时还在总部为首长们演出，很受干部战士的欢迎。

强渡嘉陵江：和死神擦肩而过

旺苍坝是红四方面军长征的结集地。1935年1月，为策应中央红军作战，红四方面军西进，开始准备长征。

在备战西渡嘉陵江时，剧社的主要任务，明确为战前战中的宣传鼓动工作和战场上的战地救护。红四方面军从上到下历来都有医院卫生所，连队还有卫生员，战斗中地方百姓还组织有担架队。而这一次渡江战役前却给了剧社战场中的救护任务，原因是地方百姓没有组织担架队和救护队，让剧社成员在战役中同时实施自救。可是，首长在下达任务时却没有明确是自救，剧社的同志就误认为只是为参战人员的战地救护。

备战中上面发来一只小药箱，药箱从班长王定国的手中又传到了陈桂兰的手上。陈桂兰哪懂战地救护这一套，觉得责任过于重大，就抱着药箱十分担心地望着班长说：

“班长，这我不行，我不懂这个嘛。”

班长王定国拍着药箱鼓励说：“行，你行，别担心。到时你跟着我，完不成任务我们班共同承担责任就是了，别怕。”

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的战役开始了，三颗红星信号弹突然在渡口江面的上空冉冉升起，随即划过黎明前的夜空。顿时，两华里多长的江面上出现了无数只木船、木排、竹排，载着英勇的红军战士向西岸急进。

木船木排竹排还没过江心，突然，西岸川军的阵地上便响起了激烈的枪炮声，顿时密集的枪弹炮弹在江面的木船、木排、竹排周围爆炸，并激起了丈高的水柱。运载工具在江面上摇晃着，有的被炮弹击中，木竹残片散落被江水卷去。

陈桂兰紧抱着药箱，坐在竹排上张着恐惧的眼睛死死地盯住对岸，武杰等人冒着敌人的枪弹奋力划着桨。突然，一颗炮弹在竹排旁爆炸，冲击起来的巨浪掀翻了竹排，竹排上的人全都跌入了江中。陈桂兰和班长王定国、副班长孙桂英等七个姐妹无一人会水，都在江中扑腾挣扎，死神的威胁越来越近。在这紧要关头，几个在水中训练有素的男红军战士便立即投入了对姐妹们的奋力抢救。很快，他们就把落水的王定国等六名女同志都重新救上了竹排，可是单单不见了陈桂兰。

陈桂兰被跌入江中后呛了好几口水，脑袋突然

就晕沉起来，浑身上下都没有了力气，只觉得在往下沉，绝望的念头立刻就涌上了她的心头，可是她仍然紧抱着药箱，因为她心里明白这只药箱跟她的生命同等重要。

就在陈桂兰感到绝望的时候，武杰在再次搜寻中发现了她。他又一次跃入江中把陈桂兰托出水面，在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才把陈桂兰拖上了竹排得以生还。

陈桂兰喝下了许多江水，肚子鼓鼓的已在昏迷状态。武杰急中生智说要把她肚子里的江水弄出来。

“这怎么弄？”大家看着躺在竹排上的陈桂兰都齐声地问。

武杰弯下腰喊：“快，把她抬起来，面朝下横担在我的腰上，让她把水吐出来！”

大家立刻照办。

陈桂兰的腹部横担在武杰的腰背上，由于重力的挤压，陈桂兰腹中的水立即就顺着喉笼、口鼻腔哗哗地流淌了出来。

陈桂兰的身子软得像面条，武杰他们把她平放在竹排上。

陈桂兰眼看着身边的很多战友牺牲在江中。但是，英勇的红军将士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前仆后继，奋勇向前，强渡成功。

强渡嘉陵江后，陈桂兰没有想到，接连不断的危险正在前方等着他们。

三次穿越雪山草地

绵延两万多里的长征路上，危机重重，陈桂兰感到比敌人的枪炮更可怕的是饥饿。由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沿途老百姓都离家逃跑，将能吃的东西都藏了起来。走在前面的部队把沿途能吃的都吃了，后面的部队就没法找到食物。很多红军战士被活活饿死在路上，饥饿也使陈桂兰骨瘦如柴，当时她的体重还不到25公斤，随时可能倒下。

长征途中，陈桂兰所在的红四方面军3次穿越草地。年轻的陈桂兰当时并不明白如此艰苦的行军



为什么会一次次重复，她知道的仅仅是不停地赶路，因为停下就可能意味着死亡。剧社大多是年轻的女孩子，长途行军又累又困，在队伍暂时停止前进的片刻，站着也会睡着。有时候夜行军途中忽然命令原地休息，一坐下就想睡，醒来一看队伍走远了，只得又拼命追赶。

长征路是异常艰苦的，剧团、宣传队要比别人多走几乎一倍的路。部队行军时，剧团必须要在队伍前头赶路；休息时，演员们还得回过头来进行慰问演出，从队头一直演到队尾。有人说：举世无双的中国长征，红军是靠一双脚板走了两万五千里的，那么，宣传队员可能要走更多的路程了。

自从渡江之后陈桂兰就患上了肠炎一直未愈，体质虚弱。一路下来好在有武杰和王定国等姐妹们的精心照顾才没有掉队，但是进入草地以后经过几次大雨的浇淋，她不时地发着高烧，走在泥泞的草地上总得是头重脚轻，晃忽悠悠。因此，她们行进的速度是特别慢，几天下来他们又掉了队，与前队的距离越来越大。

方圆百里的大草垫子就是草地。大草地的特征

就是上面长着野草，下面就是深不可测的泥潭，人一旦掉了下去就难以自拔，被泥潭吞没。

在又一场大雨过后，其中有一段路失去了路标，也不见人走过的脚印。下脚的地方无可辩认，陈桂兰飘然失足就陷入了泥潭。武杰急忙伸手去拉，可是怎么也够不着。陈桂兰站在就陷坑里哭喊着挣扎，越挣扎她越是往下陷，眼见泥潭已经淹没了她小半个身子了，武杰急中生智忙把一根棍子向她伸了过去，并大声喊抓住，别松手。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陈桂兰抓住了棍子的一端，仿佛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的稻草。武杰拼命地往上拔，众姐妹们也立刻赶来帮忙。在大家的紧急搭救之下，陈桂兰才终于被救了上来。

陈桂兰像泥猴一样流着眼泪，苍白着脸躺在草地上。过了好一阵，王定国、武杰把陈桂兰扶坐起来关切地问：“你还能走吗？”

陈桂兰眼里含着泪，看一眼茫茫空旷的草地，微微地点一下头说：“能，我能走。”

说完就站立起来挪着沉重的双腿往前走了几步，她身子摇晃得厉害，险些摔倒。王定国立马上

前扶住，又回过头去叫两个女战友扶着陈桂兰继续向前走。

经历过多次危险，陈桂兰、王定国等在艰苦的长征中坚持了下来。1936年10月，她们终于跟随队伍到达甘肃会宁，同中央红军胜利会师。

兵败河西：成为马家军女俘

红军会师以后，陈桂兰没有想到艰苦的征途并未结束。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总部及3个主力军组成西路军，奉命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打通“国际线”。陈桂兰所在的前进剧社随部队西征，向河西走廊挺进。

西路军总政治部前进剧团过了黄河以后，有干部战士八九十人，隶属总政治部宣传部领导。当时的宣传部长是刘瑞龙。后来，陈桂兰等剧团人员接受总部命令，到二十里铺准备慰问红九军在古浪战斗中负伤的伤病员。

1936年12月5日清晨5点钟，剧团人员和九军派来的几名保卫人员一行从县城出发，冒着隆冬和早晨的严寒徒步行走，到达目的地时已经8点钟左右。不巧，因敌情变化军部已经转移。前进剧团正在犯难踌躇，忽发现数里外大道上尘土飞扬，是敌人的骑兵赶来。大家调头朝西跑了一华里路，有一个大土围子就闯了进去。这个围子是郭家下磨庄，进去以后发现老百姓已外出躲避了。前进剧团一部分人用杂物堵塞门洞，一部分人爬上房顶，占据庄门门墩，控制碉楼和庄墙，在庄墙顶部四周的围裙墙上整理了射击垛口。马步芳一百师之马步奎骑兵团（黑马队）向剧团据守的围子涌来。

敌人不停地用步、机枪朝庄墙垛口射击，还有一门炮也向庄内打。两架敌机飞来周旋了几圈朝西飞走了。大家解下裹腿带连起来，七手八脚拧搓成一根绳子，从10多米高的围子上吊下去一个男同志。他爬过外围子墙，穿过围子南边的一块树林，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时近黄昏，凶恶的敌人用密集火力朝庄内扫射。七八个敌人爬上了围子东面的一棵十五六米高

的大杨树，居高临下朝庄内射击。正在屋顶指挥战斗的支部书记、政治指导员廖赤健同志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刻中弹壮烈牺牲。战士们以满腔仇恨，奋起反击，把树上的敌人统统打了下去。敌人再不敢上树了，但火力更加凶猛，发起一次次进攻。剧团政委易维精，团长周汝功，副团长汪贤巨，导演任弼璜（任弼时的哥哥）等十多名干部战士相继英勇牺牲，还有不少战友负了伤。

整整一天，干部战士滴水没进口，粒米未沾牙。饥饿严寒胁迫着每一个红军战士，但大家一鼓作气，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活着的每个人都滚打成土人儿，只有两只眼睛滚动。由于干部和年龄大一点的战士都牺牲了，弹药消耗殆尽，无战斗力，无法突围。剧团人员在敌众我寡的条件下准备坚守到天黑以后再想办法。大家把武器砸折、分散埋了，只留些长矛、马刀、木棍，又搜集砖块、石头、瓦片作为弹药断绝后的武器和敌人拼杀。不料，夜幕拉下的时候，毒辣的敌人用汽油、柴火烧开了庄门，蜂拥而入。前进剧团剩下的五、六十人寡不敌众，全部被俘。

幸运的是，疯狂屠杀、活埋红军战俘的马步芳认为“剧社有用，留着不杀”，强迫红军战士为他们唱歌跳舞，并且提出扩大剧社。

于是陈桂兰等姐妹和众多的被俘红军都被关押青海西宁集中营。这个集中营四面环山，高墙紧围，墙上电网层层，岗哨密布，看守十分严密。四面监舍相围的的中央是操场，操场的南面有道通往围墙外的出口，出口有一巨大而沉重的铁门，这里是整个监舍唯一能通往外面的关口，有国民党士兵日夜把守。据不完全统计，这个集中营内关押着的被俘红军官就有近千名，负责看守的国民党部队有一个营的兵力，这些看守大部分是马步芳的人，极其反动凶残。其监狱长是由蒋介石专门从南京派来的，受国民党军统局的直接指挥。被关押人的处置权也均由军统局和马步芳掌握。

被俘人员关进集中营之后，都要进行轮番地过堂审讯。敌人对被俘人员的审讯是极其凶残的，皮鞭棍棒、灌辣椒水、坐老虎凳、火烤、烙铁……几

个月下来，被俘的红军官兵几乎人人都已经领教过这了，虽然皮开肉绽，但陈桂兰等红军官兵们却仍是意志坚定，没有一人出卖自己的同志或自首变节。

第二年春天，陈桂兰、王定国和剧社其他成员、被俘红军官兵等80多人又被押解到张掖敌三〇〇旅旅部，由敌旅长韩起功监管，一面受到敌人的监视和奴役，一面充当临时的演员。

这80多人中，就有张琴秋、刘瑞龙、魏传统、陈淑娥、王定国、孙桂英等。当时经常关在一起的有陈桂兰、陈淑娥、王定国、孙桂英、张琴秋、刘明清、徐世淑、蔡德珍（贞）、陈秀英、董桂芳等。

为了不致暴露身份，自被俘之后陈桂兰等人便使用化名，张琴秋自称苟秀英，陈桂兰自称陈洁茹，孙桂英自称刘慧敏，徐世淑自称徐春芳，蔡德珍（贞）自称万秀芬，只有王定国没有隐瞒真实姓名。当时红军中的党员干部绝大多数都没有暴露身份。

红军战俘沉浮录

在韩起功的集中营里，被俘女红军编了一部分到新剧团，为他们跳舞唱歌。其中又有陈桂兰、刘明清、黄光秀、党文秀、陈淑娥、王定国、孙桂英、罗秀英、秋秀英、秦云杰、苟先珍、张琴秋等30多人。在新剧团，被俘人员自己做饭，自己管伙食。每天都是杂面（青稞、豆面）糊糊，也没有菜。不仅生活不好，还经常挨打受骂。但他们是不甘心受压迫的，大家想了不少方法同马匪作斗争。

其实，韩起功的这个剧社在形式上跟红军的剧社没有太多的区别，除编排一些古装戏曲等小型节目之外，也演一些带有抗日性质、为国民政府歌功颂德的节目，只是所有的节目内容丝毫不得涉及共产党或颂扬共产党的言论和主张。陈桂兰等姐妹们都没有专心致至，她们在许多节目的排练演出中都是敷衍了事。

马匪让大家跳舞唱歌，但他们没有人教，仍让被俘女红军跳红军的舞，把红军的歌改几个字，用原来的曲调唱。红军有一首歌词是“鼓声咚咚，红旗飘飘”，马匪把“红旗”二字改为“国旗”，可

是大家在演唱中仍唱“红旗飘飘”。有时他们不注意，就过去了，有时听出来了，就把她们打一顿。其实，挨了打她们心里也是高兴的，因为大家唱的还是红军歌。

当时，国民党中央局属下的蓝衣社在上海十分猖狂，他们在中统局的操纵下为国民政府刺探情报、残害知名人士、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王定国就和她的姐妹们编了几句责骂蓝衣社的顺口溜，并当成歌来唱：

蓝衣社不要脸，端着中统局的讨饭碗；
给根骨头和剩饭，摇着尾巴喜上天。

一天，陈桂兰在屋子里清唱，王定国等众姐妹们觉得好听，于是都跟着唱了起来。这一下让韩起功司令部参谋处少校参谋保存勋知道了，招来一场横祸。

“混蛋！”包参谋以为是孙桂英带头唱的，他狠狠地给了孙桂英一记耳光。随即又对着门外站岗的士兵喊道：“这些人不思悔改，还想造反。把孙桂英关厕所里去！其余的人统统关禁闭，饿她们两天饭！”

两天后，王定国、陈桂兰等人从禁闭室里放了出来，被包参谋训斥一番又恢复了有限的自由。可是孙桂英仍被锁在那臭气熏天的厕所里，每天还要接受审讯。饥饿、皮鞭把她折磨得都瘦了一大圈。审讯中她只有两句话“我恨蓝衣社，歌词是我编的”。正因为她强硬地立场，才受到严酷的迫害和保护了大家。后来，部队打散后混在司令部参谋处当勤务兵的武杰知道情况后，才悄悄把孙桂英放了出来。当然，武杰也被关了3天禁闭。

其实，就在王定国、陈桂兰等被俘女红军在新剧团和敌人斗争的时候，共产党组织一直没有放弃对她们的营救。她们刚刚被俘关押在马元海设在东十里铺指挥部一座庙里的后院的时候，总部曾设法营救她们，给马元海去了信，要求释放她们，但马不干。总部又以一次战斗中俘虏的敌人工兵营为条件交换，马元海也不干。



王定国和陈桂兰（左）北京家中小院合影。

1937年7月7日，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党中央在兰州建立了八路军办事处，由谢觉哉出任党代表。根据毛泽东和朱德的指示，谢觉哉一到兰州便着手进行营救西路军失散人员的工作。受谢觉哉委托，在兰州和河西走廊各县有一定社会基础的传教士医生高金城来到张掖，开设了一所福音医院，为我党营救和收容西路军失散人员提供掩护。

接着，高金城以医院救护伤员的任务重为由，亲自出面向敌旅长韩起功借出王定国、陈桂兰等7名红军剧社人员到医院当护士。在高金城帮助下，王定国等立即开展秘密接应西路军被俘人员的工作，福音堂医院也成为张掖县秘密党支部的秘密联络点。

此后，由于营救活动引起敌人的怀疑，张琴秋、王定国、武杰等人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党组织决定安排她们立即转移。

王定国，1937年9月在秘密党支部的帮助下，

踏上了去兰州的路途。后成为谢觉哉的夫人。1983年，王定国重访甘肃。了解到还有一批滞留在甘肃、青海的西路军被俘和失散人员生活困难的情况后，便和伍修权等老同志一起用了一个多月时间进行实地调查，向中央写了调查报告和建议，对解决西路军老战士的生活待遇等问题起到了重要作用。

张琴秋，被俘后化名苟秀英，装成烧火做饭的炊事员。后来王定国等人以剧社都是小孩不会做饭为名，提出让“苟秀英”来剧社当炊事员。敌人没有发现破绽，张琴秋顺利来到剧社掩护了身份，躲过了一劫。后来，由于叛徒告密，张琴秋被押送到南京，经周恩来营救才返回延安。后任国家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

武杰，在地下党组织帮助下也千辛万苦到了兰州八路军办事处。

遗憾的是那些还没有来得及救出去的被俘人员，从此沦落天涯，生死茫茫。

孙桂英，当时被押到甘州，敌参谋罗平见孙桂英长得好看，想占为己有。韩起功不同意给罗平要给回族人，孙桂英不同意。于是韩借口送她去凉州在路上杀掉。

陈淑娥，从剧社押解到青海后，被马步芳的总指挥马元海一眼看中，点名强暴她做了小老婆。

蔡德贞，韩起功先是威逼她和手下军官张水清结婚，后又把她卖给回民阿訇。

陈桂兰，不，陈洁茹，被韩起功逼迫嫁给手下参谋保存勋，先后居住青海格尔木、西宁市雷鸣寺街。后于1939年、1941年生育一女一子。保存勋，（1908--1950）上校，号九章，青海乐都人。国民党中央军校第10期炮科毕业。抗战期间曾任青海省门源县县长，1942年兼任门源县国民兵团司令，抗战胜利后曾任青海团管区司令，1949年10月在青海投诚，1950年被枪毙。

1950年，陈桂兰带着一对儿女，回通江、广元生活。后来跟随丈夫王持山定居在四川省旺苍县东河镇老城，1958年生育一女。从此，陈桂兰一直背着“国民党反动派太太”“特嫌”的身份，更名陈洁茹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

相会在北京

1982年，旺苍县开始全面落实在乡老红军、西路红军和流落红军等政策，陈洁茹因无明确人证、物证，一次次申诉一次次失望。一个偶然的机，陈桂兰在电视上看见了王定国出现在1983年国务院的元旦节团拜会上。她马上找人四处联系。可是一直没有消息。

又一个偶然的机，原铁道兵副司令员徐斌知道陈桂兰在到处打听王乙香和武杰的消息，他当时虽然不知道王乙香就是王定国，但是他却了解武杰的情况。在抗美援朝时，都在一个师，武杰曾任师政委，自己当副师长。现武杰在原解放军总参谋部军务部任职。

武杰从徐斌那里知道消息后，马上与王定国联系。

1985年初，王定国第一次看到陈桂兰写的信件时，开始是惊喜，到后来十分严峻。她突然把信纸重重地拍在案桌上愤怒起来了：“这事早就该落实了，咋现在还搁置不理？这不是把中央政策当儿戏嘛！人家不是交待得很清楚有我在嘛！为什么不派人来找我为人家作证！说无人可证实她的问题，这简直就是个托词！”

王定国清楚的知道，两年前国务院就下发了关于落实西路军失散红军干部战士的政策文件，文件明确规定只要健在的失散人员不属于变节投敌那类的，一律定为流落红军等，政府应发给一定的生活补助。陈桂兰的那段历史她是十分清楚的，她不是变节投敌的那一类。其实，在落实国务院这项政策的过程中，王定国和武杰曾经还分别以个人和组织的名义，向甘肃、青海等地去信函查找过失散了几十年来的陈桂兰，但终归毫无下落。他们都以为，这个曾与之同过生死患难的姐妹不在人世了呢。

于是，王定国和武杰马上写出了证明材料和国务院关于落实西路军失散红军干部战士的政策文件，转交旺苍县政府和民政部门。陈桂兰这桩久拖了几十年来的历史问题，由于有了她红军时期

老战友的得力证明和中央政策，很快就得到了澄清，被认定为红军流落人员。从1983年12月1日开始计算。

自从陈桂兰知道同生死共过患难，一同打过江山的武杰和王定国还活着的时候，她又在心里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生前一定要去北京和这些老战友见上一面。

她的这个心愿最终还是实现了。

一九八五年五月的一天，武杰在外地考察中遭遇车祸，伤势严重住进了北京三零一医院。病中的他想见见老战友陈桂兰。武杰的妻子在北京通过部队的三五站终于和陈桂兰取得了联系。陈桂兰听到这里，比自己生病还着急。

她马上踏上了进京的旅途。经过两昼夜的行程，终于到了北京。根据时间安排，陈桂兰先去了王定国那里。

在王定国的小院子里，两个一同经过患难的老太太终于见了面。两人热烈地拥抱着，谁都不肯先松开手。

王定国拍着陈桂兰的后背：“陈桂兰呀，真没想到你还活着呀。”

陈桂兰也拍着王定国的后腰：“我也是呀，真想你们。”两个老人的眼泪都相互滴落在对方的肩头上，把衣服都印湿了一片。热烈的拥抱之后，陈桂兰在王定国家中的办公室内进行了长谈，喜悦让她俩切切私语，让她俩谈笑风生。上午谈下午说，一同患难过的姐妹总有说不完的知心话，有道不完的缠绵之情。为了这个永远也不能够忘却的纪念。王定国还专门打电话叫来了照像师，在自己家里的小院子里为她俩摄下了一张相识以来，唯一的一张珍贵的合影像片。

陈桂兰惦记着在医院的武杰，吃过晚饭后，她就匆忙地向王定国告别，要去医院探视，却被王定国挽留留下来。

在王定国家住了一宿，两个老太太几乎又切切私语了一宿。第二天早上，王定国就让司机把陈桂兰先送去武杰家看看，再送去医院。

当武杰料定是陈桂兰来了的时候，他想从轮椅

上站起来，可是腰部一点力气都没有。他拍拍轮椅的扶手，遗憾地长叹了一口气。武杰压抑住内心的激动，目不转睛地直视着向他走来的陈桂兰。到了面前，还是武杰的妻子指着也一直盯着武杰没有出声的陈桂兰对他说道：

“不认识了啊？她就是你一直念叨了多年的陈桂兰呀。”其实，自从陈桂兰站到了他的跟前，他还在一言不发地审视着她。她变了，当年那个天真活发身材纤细漂亮的小姑娘，如今被历史的苍桑演变成了体胖、头发斑白、脸上长满了皱纹的老太太。看得出陈桂兰此刻的内心也很激动，但是她没有叫。武杰知道，她也是在极力控制着自己激动的情绪。

武杰听到老伴儿的一句提醒，似乎才从梦中醒来。他忙笑盈盈热情地把一。只手向陈桂兰伸了过去：“你好吗？欢迎你来北京，感谢你来看我。”

陈桂兰弯下腰双手握住武杰的手，稳重而又激动地回答：“好，好，还好，你好些了吧？”

四十多年后重逢，他们有说不完的话道不尽的患难情。他俩一个半躺卧在病床上，一个坐在床前的椅子上，像兄妹一样谈得热烈，说得默契和拍，更多的还是对过去的回忆和怀念。

在生治医生的催促下，他俩谈话的时间被终止了。陈桂兰握着武杰的双手叹了口气说：“好啦，很高兴见到了你，也见到了王定国，我死了也瞑目了。将来有机会，我还要来看你们。再见……”

陈桂兰等人都没有想到，这竟是他们的最后一面。

1989年3月27日，武杰在北京逝世，终年72岁。武杰，原四川巴中县人，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原解放军总参军务



王定国、徐斌、陈桂兰之女王利敏（右一）在旺苍（1992年12月）。

部副部长。

1992年4月5日，陈桂兰在旺苍县老家家中逝世，享年73岁。

1992年12月24日，王定国和原铁道兵副司令员徐斌来到旺苍，王定国一走进文昌宫对面的王家大院，就激动地指着正屋对随同人员说：“那是徐向前住的。”又指着右侧的偏屋说：“我就住在这里。”在川陕省苏维埃保卫局旧址，徐斌兴高采烈地说：“我当时就在这里工作。”两位红四方面军老人，比导游还熟悉当年“红军城”的情况，在一些红军遗址，他们不但能说出当时的负责人，还能说出许多普通战士的姓名，以及他们中谁已牺牲，谁已故去，谁还活着。

当他们打听到陈桂兰已经故去，十分难受。王老对陪同人员说，在你们这里我还有一个战友叫陈桂兰，可惜她已经去世了。

（作者单位：广元市旺苍县自然资源局）

» 省委党史研究室贯彻落实彭清华书记批示精神 谋划部署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工作

4月15日，省委书记彭清华在省委党史研究室呈送的专题报告上作出批示，要求围绕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结合实际，谋划实施一批党史研究、宣传重点项目。

为切实贯彻落实彭清华书记批示要求，充分发挥和展示全省党史部门职能职责优势，扎实做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有关工作，4月17日，刘晓晨主任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对全省党史系统进一步做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有关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

会议学习了彭清华书记批示内容，并围绕贯彻落实进行了讨论发言。大家一致认为，彭清华书记的批示体现了省委对党史工作的重视，表明了省委对党史部门寄予厚望，全省党史工作者一定要振奋精神、主动作为，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工作中作出应有的努力和贡献。刘晓晨主任指出，省委党史研究室要结合2018-2022工作规划，加强顶层设计，进一步完善充实年初方案，在研究、编撰、学术活动、社会宣传、审读审看等方面下功夫，统筹联合相关单位、市（州）党史部门、媒体等，按质保量完成各项目标任务；各级党史部门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强化领导，落实责任，统筹力量，积极参与地方党委和上级部门组织安排的有关工作，努力作出新贡献，不断开创新局面。

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仁、江红英以及各处室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

» 刘晓晨主任一行赴乐山、眉山等地调研指导党史工作

4月9-10日，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刘晓晨一行赴乐山、眉山调研指导党史工作，先后到金口河区铁道兵博物馆、青神县红色西山多功能教育基地等地，对纪念场馆建设使用、陈列布展和发挥党史育人作用等情况进行了调研，对陈列布展、党史“七进”等工作进行了指导。

刘晓晨主任对乐山、眉山等地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党史宣传教育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对进一步做好党史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一要进一步打造好四川省中共党史教育基地。二要充分保护利用好本地党史文化资源。三要不断创新党史宣教方式方法。四要深化党史研究。

调研期间，刘晓晨主任与乐山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彤，乐山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统战部长熊伟就乐山党史文化资源更好地融入文旅经济发展等问题交换了意见；与眉山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汪树槐就机构改革与党史工作职能等有关问题交换了意见。

» 刘晓晨主任专题研究四川网上党史馆和四川党史文献数据库建设工作

4月4日，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刘晓晨主持会议，专题研究四川网上党史馆和四川党史文献数据库建设启动工作。会议听取了宣教文献处、党史二处前期考察调研相关企业和单位的基本情况，以及关于四川网上党史馆和四川党史文献数据库建设工作建议方案的汇报，参会同志重点对《建议方案》

进行了深入细致讨论，对进一步完善方案提出了修改意见建议，并表示一定按照会议要求，扎实推进落实各项工作。刘晓晨主任在总结讲话中，对相关工作提出明确要求，进行了全面部署。室副主任江红英、机关党委书记郭生春、各处室主要负责人和宣教文献处全体同志参加了会议。

此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四川网上党史馆和四川党史文献数据库建设工程的全面启动。

》省委党史研究室、省地方志办联合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四川大事记》编写初稿审改会

3月26日，省委党史研究室、省地方志办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四川大事记》（简称《四川大事记》）编写初稿（样稿）审改会。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江红英、省地方志办副主任陶利辉出席会议。省委党史研究室原副巡视员宁志一、党史研究室二级巡视员周锐京及相关处室负责人、《四川大事记》编辑室全体工作人员参加会议。

本次审改会是在四川大事记编纂工作进入文稿编写攻坚阶段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旨在听取双方意见，统一双方认识，共同提高全书编纂工作整体质量。会上，陶利辉强调了编纂工作的重要政治意义和现实价值，充分肯定已取得的编纂成绩，高度评价了本次审改会在时效上和编纂指导上发挥的重要作用。江红英对双方合作编纂的工作模式给予充分肯定，并对全体编纂人员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表达敬意，希望所有同志再接再厉，争取编纂出充分展示双方实力水平、经得起现实和历史检验的精品，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献上一份厚礼。

》省委党史研究室与来川的新疆党史工作考察调研组进行交流座谈

近日，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院长祁若雄带领的来川考察调研组一行就“四川党史一卷”编撰工作进行了交流座谈。座谈前，刘晓晨主任接见了考察调研组全体成员，对祁若雄副院长一行表示欢迎，并就有关工作进行了沟通交流。

座谈会上，江红英副主任向客人介绍了省委党史研究室近年来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先后出版党史基本著作、开展专题研究、推进资政工作等情况；周锐京详细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第一卷）》编撰情况和修订情况。祁若雄介绍了新疆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机构改革和机关工作情况，指出四川党史资源丰富，党史研究和宣教工作成绩突出，对新疆正在进行的《中国共产党新疆历史》的编撰有着借鉴和启发作用，希望两地党史部门进一步加强交流和合作。会上，双方还就相互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咨询、解答。

》雅安市举办“学习强国”有奖知识竞赛

近日，由雅安市委宣传部、市委组织部、市委党研室（市地方志办）、市直机关工委联合主办的雅安市“学习强国”有奖知识竞赛正式启动。竞赛活动题目从“学习强国”平台的每周一答、智能答题、专题考试题库以及党的建设、党史国史、干部队伍建设、廉政建设、改革创新、市委中心工作等知识点中产生，广大群众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参与答题。此次竞赛活动旨在充分调动全市广大党员、群众学习使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以赛促学、以学促做、融会贯通”的良好学习氛围，为加快推进绿色发展示范市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省委党史研究室 积极参与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建设



室主任刘晓晨参与植树。



室主任刘晓晨带领全室干部职工参与植树活动。



室主任刘晓晨听取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建设推进情况讲解。

为贯彻落实四川省直机关、高校、企业、金融机构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包山头”植树履责活动动员大会精神，3月21日上午，室主任刘晓晨率领全体干部职工，赴成都市龙泉驿区茶店镇民主村开展义务植树履责活动，机关党委书记郭生春一同参加。挖土刨坑、挥锹铲土、扶正树苗、培实新土、提桶浇水……山坡上一派热火朝天、忙碌有序的景象，全室干部职工鼓足干劲，分工协作，密切配合，大家一共栽种樱花、香樟、玉兰、金丝楠木等优质树木大苗150株。

植树活动后，全室干部职工在室主任刘晓晨的带领下，实地察看梦里桃乡水蜜桃产业园建设情况，了解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总体规划和推进措施。

刘晓晨强调，党史部门要坚持“一突出、两跟进”，充分发挥职能优势，加大生态文明建设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研究力度，在景观建设、遗址保护、文化传承等方面多开展针对性的调查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和建议，为加快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多做贡献。

（机关工会、成都市龙泉驿区委党史研究室 供稿）



德阳市竹新镇的月季产业园